

5061/5600.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UB

JUL 28 1959

# 中國語文

38

1955.8



## 中國語文 1955年8月号(总第38期)目录

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章 慤 (3)

### 讨论和研究

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林 燾 (4)

谈谈声调问题.....喻世长 (10)

批判胡适反动的语言学观点.....殷德厚 (12)

布拉格学派(批判特鲁别茨科依的音位学说).....谢尔久琴柯 (23)

电码改革问题的研讨.....王蔭槐 馬玉崑 (26)

文字改革工作中的铅字改革问题.....陳 越 (28)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优越性.....丁勉哉 (32)

### 语文知识讲话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七).....苏联 A. A. 龍果夫 (34)

### 信箱

对于汉语规范化的意见.....丁 是 (39)

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几点意见.....鮑幼文 (39)

建议简化三个虚字.....陈大愚 (40)

我们拥护“汉字简化”.....許錫丰 (41)

“打仗”、“打架”是不是词?.....鍾本康、鍾 棧 (41)

略语是不是词儿?.....鄒國統、呂叔湘 (43)

### 语文笔记

谈“的”字的分化.....李 子 木 (22)



# 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

章 翥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带有决定意义的纲领，是和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的计划。这个计划的基本任务是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初步的基础，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打下基础。

这个计划完成后，我国的经济、文化事业将有各种不同程度的进展。拿1952年和1957年指标做比较，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将由26.7%上升为36%。生产资料的产值在总产值的比重将由39.7%上升为54.6%。社会主义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将有如下的变化：国营、合作社营和公私合营工业的比重将由61%上升为87.8%；私营工业的比重将由39%下降为12.2%。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将增加23.3%。教育事业也有增长：高等学校学生数将增加127%；高级中学学生数将增加178%；初级中学学生数将增加78.6%；小学生数将增加18%，在校小学生人数将占全国学龄儿童总数70%以上。

以上所列举的只是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的一部分数字。由此可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将给我国经济、文化、教育，特别是国民经济，发生重大的变化。“这一切变化无疑地将进一步地巩固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地加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并为进一步地改善我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生活创造条件。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关系着我国国家命运和人民幸福的大事情。可以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使我国繁荣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第一个计划。这个计划的实现也将增强世界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已经于七月三十日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作出决议。我们语文工作者应该跟全国人民一道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各个年度计划而奋斗。

作为人们交际、社会斗争和发展的工具，语文跟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人民日常生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所做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通过语文来表达和传达。因此，正掌握祖国语文并提高使用祖国语文的效能，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是有一定的意义的。

语文工作者应该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好语文工作，使语文在自己所服务的事业中发挥它的作用。语文工作者大多数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应该为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为传播正确语文知识和培养使用语文的熟练技巧，为正确地使用语文，为语文的纯洁和健康而奋斗。语文工作者应该做文字改革的先锋队，为使文字容易为人民大众所掌握和更有效地为社会事业服务而斗争。此外，语文工作者应厉行节约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更多的资金，提高革命警惕性，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

# 关于汉语规范化问题

林 熹

在沒有談到漢語規範化問題之前，必須對普通話、大眾語和文學語言的關係有所說明。只有弄清楚了普通話、大眾語和文學語言的分別，才有可能正確地理解漢語的規範化問題。

“普通話”這個名稱早已存在<sup>①</sup>，一般是指不純粹的北京話。瞿秋白同志曾對普通話的內容做了如下的說明：

最近三十年來，凡是新的研究學術所用的言語，工商業發展之中的技術上的言語，政治上社會交際上的言語，事實上大半發生於“南邊人”的嘴裏。——江、浙、贛、粵、湘、鄂、川等省的人的嘴裏。同時，這裏又並沒有歷史久遠的一個中心城市；大家只能學着北京話。結果，勢必至於是“藍青官話”變成實際上的普通話<sup>②</sup>。

我們知道，各地的“藍青官話”都帶有自己的地方方言色彩，很難找出一定的標準。如果想從各種不同的“藍青官話”中找出一個共同的標準，那仍舊是北京話，因為各地的“藍青官話”實際上都是以北京話為基礎，但是都摻進了一些自己地方方言的成分，而摻進方言成分的多寡又是因人因地而異的。

我們一般所指的“普通話”就是這種“藍青官話”，這種普通話的產生是文學語言發展過程中所必經的階段，由這種普通話可以看出來方言怎樣逐漸趨向於文學語言。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文學語言多麼發達，只要方言還沒有被全民語言完全消磨掉，這種“藍青官話”式的普通話就一定會存在。但是，在文學語言的影響下，各地“藍青官話”的差別將要逐漸減少，到這差別消失的時候，方言才可以說完全被消磨掉。“藍青官話”式的普通話只是方言被消磨的過程中的具體反映，它並不是文學語言。

有些人只是片面地看到普通話的勢力正在逐漸擴大，而沒有找到這種勢力擴大的基本原因，於是把作為文學語言的基礎的北京方言和普通話對立起來，認為文學語言應該只以普通話為基礎，理由就是說普通話的人要比說北京方言的人多得多，這是錯誤的看法。

“大眾語”這名稱產生於“普通話”之後，1934年

秋天起，在上海展開了大眾語問題的論戰。從這戰以後，“大眾語”這個名稱才正式確立起來。

所謂“大眾語”，應該了解為整個人民大眾的語言，不能把它和知識分子的語言對立起來，當時大眾運動的總傾向也正是如此的。但是，當時馬爾學派軍閥式地統治着整個蘇聯語言學界，有些人在參戰時不免受到了馬爾學派的一些影響。這些人沒注意到大眾語的全民性，而把它作為一種階級語言看待，因此把大眾語和知識分子的語言對立起來。這種偏向對後來是起了一些影響的。直到最近，還有知識分子的語言採取了否定的態度，這種看法是錯誤的。

當胡適對大眾語進行惡毒的誣蔑時<sup>③</sup>，魯迅就曾給予了無情的揭露與反擊，為大眾語運動掃除障礙。但魯迅先生的偉大還不僅在於此，更重要的是他在當時對現代漢語文學語言已有了明確的認識，且看出了在大眾語運動中一些人所存在的偏向：有些人把大眾語當作階級的語言而否定知識分子的語言時，魯迅先生立刻指出了這些人的錯誤：

讀書人常常看輕別人，以為較新、較難的字自己已能懂，大眾却不能懂，所以為大眾計，是必須講白話的；說話作文，越俗，就越好。這意見發展開來，要不自覺的成為新國粹派。或則希圖大眾語在大眾行得快，主張什麼都要配合大眾的胃口，甚至於說“合大眾”，故意多罵幾句，以博大眾的歡心。這當然他的苦心孤詣，但這樣下去，可要成為大眾的新帶頭人。

說起大眾來，界限寬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樣的人，但即使“目不識丁”的文盲，由我看來，其實也和讀書人所推想的那麼愚蠢。他們是要知識，要新知識，要學習，能攝取的。當然，如果滿口新語法，新詞，他們是什麼也不懂；但逐漸的檢必要的灌輸進去，

① 普通話這名稱產生的具體時期很難確定，起初曾用“官話”這名稱，這也表現了漢民族語上昇發展的傾向。魏建功先生根據“普通”這個詞來自日本，斷定“普通話”必須是晚清以後新創出來的。這說法是可信的。

② 《瞿秋白文集》，2卷，673頁。

③ 參看《大眾語在那兒》一文，《胡適論學近著》，551頁。



們都會接受：那消化的力量，也許還賽過成見更多的讀者人。……所以，新國粹派的主張，雖然好像為大眾設想，實際上倒盡了拖住的任務。……所以，‘迎合大眾’的新幫閑，是絕對要不得的①。

魯迅先生當時雖然沒有明確提出語言沒有階級性，但是他已看到把大眾語和知識分子的語言完全對起來是錯誤的。他勸告這些人不要成為“新國粹派”，要成為“大眾的新幫閑”，他指出提倡大眾語不是為“迎合大眾”，而是為了提高大眾。

遠在二十年以前，魯迅先生就以非常的遠見對文學語言的規範化進行了積極的工作，他的意見在今天有其巨大的意義，這很容易使我們想到高爾基在馬學派稱霸時期對蘇聯文學語言規範化的偉大貢獻。建立現代漢語文學語言規範化的今天，我們有必要重新學習一下魯迅先生的這些透闢的見解來加強我們工作中的警惕性。

## 二

現代漢語文學語言應該以活的口語為其基礎，而存在於人嘴裏的活的口語一般說起來都有它的方色彩，因此，在談文學語言規範化以前，必須弄清文學語言和方言的關係。

A. C. 契科巴瓦曾對文學語言和方言的相互關係下列的原理來表明：1. 文學語言照例只有一個，文學語言是在某一種方言的基礎上建立的②。第二對我們尤為重要。如果不注意到基礎方言的作用，很容易受到馬爾“方言融合論”的影響而走上了錯誤道路。

現代漢語文學語言毫無疑問是應該以北京方言作它的基礎方言的。這首先因為北京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幾百年來，漢語的文學語言始終是北京方言為基礎來醞釀的，在目前，廣播、電影、劇也已經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傳播到全國各個角落。從這種情況可以看出來，北京方言對使用其他方的人已經產生極大的影響，這就使得北京方言必須為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基礎方言。

但是，以北京方言為基礎並不意味著排斥其他方言。恰恰相反，方言是文學語言不斷豐富的源泉。文學語言一方面不斷從各方言中吸取優美的富於表現力成分來豐富自己，另一方面也給予各方言以影響，使它們服從文學語言的規範。

不過，我們也不能因為北京方言只是文學語言的基礎，而任意從北京方言中取消一些東西，或任意從各方言中選擇一些東西加進北京方言。我們對所謂

“基礎”應該有一個整體的理解，不能把“基礎”看成四分五裂，可以任意增減的東西。除了一般詞彙以外，主觀地想在基礎方言的語音、語法或基本詞彙上增減一些東西是不正確的。我們絕對不能忘記文學語言以活的口語為基礎的這重要原則，如果主觀增減的結果使得建立起來的文學語言不具體存在於任何一個人的口裏，那就是違反原則的，自然也就是行不通的。目前主張由各方言柔和成普通話再發展成文學語言的人雖然已逐漸減少，但是主張由基礎方言中去一些東西，再由各方言中採取一些東西的人仍還不少，這現象尤其表現在語音方面，這就是想使我們的文學語言脫離了現實的活的口語的基礎，變成架空的东西。

文學語言不但是要以活的方言為基礎，而且要和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相接近，日常生活的口語一般說起來都有其方言性，文學語言只有和它相接近才有可能把各方言中有價值的東西吸收進來。如果文學語言和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之間存在着較大的差異，那就等於拒絕用活的方言口語來豐富自己，其結果就使得文學語言不能向前發展（中國的文言文就是這種性質）。必須指出，只有在人民掌握政權之後，城鄉對抗性的矛盾已不存在，文化教育逐漸普及，文學語言才真正有可能迅速地和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相結合。在反動階級掌握政權時期，縱然建立起了全民的文學語言，也是不能和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緊密結合的，更不容易從各方言中大量地吸取養料來豐富自己，在那時候，文學語言是不可能迅速地發展的。只有在人民掌握政權以後，文學語言才能獲得充分的、毫無阻礙的發展。

但是，文學語言和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的相結合絕對不能了解為簡單地寫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前面已經說過，文學語言是經過加工的，文學語言一定要超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的範圍而成為推動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向前發展的主要力量。因此，文學語言一方面要依靠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向前發展，另一方面又成為發展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的力量。我們反對把基礎方言任意增減，我們也反對死抱住基礎方言作為一成不變的標準。我們不能把基礎方言和文學語言之間簡單地劃一個等號，文學語言（包括書面的和口頭的）有提高一切方言

① 《且介亭雜文》：《門外文談》，《魯迅全集》6卷，109—111頁。

② 參看 A. C. Чикобава 著，周嘉桂譯：《語言學概論》上冊，107頁。

(包括基礎方言)的責任。普希金說：“僅僅用口語來書寫意味着還不懂語言”，這句話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在這裏有必要談一下近幾年常常提到的“寫話”。寫“話”，是正確的，但是要寫規範化了的“話”；如果只是要求寫出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那就是忽視了書面語言的加工作用，這點在後面還要提到。至於為了普及教育而要求初識字的人“寫話”，則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們應該要求初識字的人能夠由寫日常生活的話逐漸提高到寫規範化了的話，這樣才符合文學語言總的要求。

為了避免文學語言發展的自流現象，我們必須使文學語言規範化。現代漢語的方言眾多，差別也比較大，這自然為文學語言提供了無限的、極端豐富的源泉，但是對文學語言規範化的建立也帶來了不少的困難。因此在討論漢語規範化問題時，對文學語言和方言之間的關係更需要有一個正確的理解。

### 三

討論了文學語言和方言之間的關係之後，才有可能再進一步討論文學語言的規範化問題。具體一點說，也就是文學語言中語音、詞彙、語法這三方面如何規範化的問題。首先，我們應該對“規範化”這概念做一個總的敘述。

文學語言是民族共同語的加了工的形式，而方言土語則是文學語言豐富的源泉，因此規範化一般只及於文學語言，文學語言應該在一定的規範之下吸收方言土語中的成分。契科巴瓦說：“文學語言的發展不能不加以管理，不能不加以規範。然而誰也不管某村或某州某區的人怎樣講話，因為方言口語的規範是沒有確定的；它的發展是沒有任何機關加以規範化的<sup>①</sup>。”這一段話很重要。各個方言如果都加以不同的規範，勢必會妨礙到方言應該在統一的民族語言領導下逐漸消滅掉這個總原則。相反地，文學語言則必須加以規範化，這樣才使得文學語言在豐富自己時（不管是吸收方言成分還是吸收古語或外來語）有一定的規範可以遵循，否則文學語言的豐富一定要跟着帶來文學語言的混亂或分歧。在文學語言有一定的規範的影響下，方言土語才更容易逐漸趨向於統一的文學語言。方言土語沒有自己的規範，但是它一定要處在文學語言規範的影響之下而逐漸向後者集中。

把文學語言加以規範化並不是給文學語言規定下若干死板板的條例使得它不能向前發展；恰恰相反，為了促進文學語言的發展，我們才必須使它有一定的規範。語言永遠不停地發展，如果不加以規範而在發

展中產生自流現象，這將對語言整個的發展帶來一妨害。由此可見，我們所說的規範化和資產階級語言學者所謂的“標準語”是有本質上的不同的。“標準語”是靜止地、孤立地看語言，給語言定出若干條來叫人遵循，並且把它和方言土語完全對立起來，就使得語言的發展受到一定的阻礙；“規範化”則是語言的發展給定出一定的規範，從而促進語言的發展。“標準”是死的，“規範”是活的。當然，給“標準”以新的內容把它作為規範化的同義語，也不是不可的。

因此，我們不能只憑少數人的直覺或主觀看法確定哪些合乎規範，哪些不合乎規範。例如我們不只墨守自己口語的習慣就認為“解放”“豐富”“鬥爭”些詞兼跨詞類的現象是不應該的，我們也不必因為有些人喜歡濫拆雙音詞而矯枉過正地認為“鞠了三個”是錯誤的。因為這樣就容易使語言僵死不動。規範既是離不開語言的發展，那麼它就必須根據語言內部發展規律來決定。而不能只是孤立地看成一時或一地的語言。就目前漢語的情況來說，在整個語言內部發展的規律之下，規範化還要特別着重於能夠適應從字轉變到拼音文字的過程。

在目前，我們建立現代漢語文學語言的規範必須反對以下三種傾向：

一、反對形式主義的搬用——有些人，尤其是學寫作的人，對於文學語言的加工了解得不正確，知道文學語言的加工是為了更自然，更準確，因而在寫作中堆砌一些“美麗的詞藻”，以為這樣就能提高我們的語言。也有一些人，並沒有認真學習祖國語言，不注意祖國語言的內部規律，而只是形式地學習外國語言，生硬地搬用一些外來詞語或語法形式砌到自己的語言裏去。這種情況在翻譯作品中最為明顯。這些形式主義的傾向已經有很多人指出來過，還談不上是語言自發性的發展，這對語言的發展有害，在建立語言的規範化時，首先必須反對這種形式主義的傾向。

二、反對自然主義的濫用土語——有些人誤解文學語言必須以人民大眾活的口語為基礎這原則，為如實地把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記錄下來就認為文學語言，而文學語言也應該完全以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口語為其規範。這種自然主義的傾向毫無疑義就是魯迅先生所說的“大眾的新幫閑”。有人用這種傾向來寫文章，有人用這種傾向來研究漢語，這種

① 同⑤，109頁。



當大的。我們完全贊成在文藝作品裏適當地運用方言土語，這是文學語言吸收方言土語中優秀成一個很重要的方法；我們也完全贊成細緻深入地一種方言土語（尤其是作為文學語言基礎方言的話），這對於文學語言的規範化將起很大的作用。創作也好，研究也好，只有在正確地認識文學語言規範化的作用的前提下，才能發揮積極的意義；只能給羣眾帶來錯誤的影響，對文學語言的傳播起阻礙作用，那麼自然也就妨礙了語言的發展。

三、反對主觀主義的自創規律——有些人在寫文把語言中一些特殊的，不能成為規律的熟語當作，把這種自創的“規律”任意類推運用。例如根據“鞠躬”、“理着髮”就類推出“哄着笑”、“動了員”。一些人只是根據自己主觀的看法“創造”出一些除已誰也不懂的所謂“生造詞語”。這些做法都給語帶來相當大的混亂。

由以上可以看出來文學語言規範化的建立是一件複雜艱巨的工作，這個艱巨的任務絕對不是幾個或一些語文工作者所能完成的。無論是文藝創作、政治論文、翻譯作品、公文書信，都對文學語言規範化起着巨大的作用。尤其是文藝工作者，首先把語言的規範化當作自己的一項嚴重任務，應該到已有促進語言規範化的責任，更應該認識到規範化對文化的發展和普及所起的巨大的作用。

#### 四

下面具體討論一下現代漢語文學語言中語音、語詞彙三方面的規範化問題。這問題太大，不是這篇文章所能解決得了的，這裏只能根據前面所談的原則談一些個人的體會和看法。

首先談現代漢語文學語言中的語音規範化問題。語音規範化本是文學語言中的嚴重問題，但是在漢字的今天，這個問題的性質有些特殊，無論說種方言的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音讀出漢字，了解語言。在使用漢字時期，語音規範化的重點應該統一字的讀音問題上，這對於未來拼音文字的推廣極大的幫助。在這個時期我們更應該努力去建立觀念，打倒漢字觀念。在製定拼音文字時，語音規範化則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問題。經過幾十年尤其是解放後幾年來語言學者的努力，語音規範問題比較地有條件解決了，存在的問題也非常具體，因此在這篇文章中也準備多談一些語音的規範問題。

現代漢語文學語言既以北京方言為基礎，它的語

音規範就不能離開北京音系。所謂以北京方音為基礎似乎應該理解為基本上不打亂北京方音聲、韻、調配合的關係。如果名義上是以北京方音為基礎，可是製定出來的語音規範和拼音文字，會說北京話的人根本念不出，寫不出，反而要整天拿着正音、正字的書籍來說話或寫字，那麼原有的北京方言就完全失去它的基礎作用了。

有些主張分尖團的人估計了一下全國各主要方言尖團分佈的情況，於是得出結論說：全國分尖團的方言比不分的方言多，因此我們文學語言或拼音文字應該分尖團。還有人從北京郊區或南城找到了一些分尖團的例子，就說：“看，北京方音也分尖團。”這種簡單地少數服從多數的機械看法是不對的。難道我們要求所有不分尖團的人都像京劇藝人那樣下死工夫去記尖團嗎？與此相反，要求自己的方言中分尖團的人在文學語言和拼音文字中不分尖團是不難的，因為尖團的合併有一定的規律，不必一個字一個字的死記。

除了尖團音問題以外，聲調的存廢也是目前爭論的問題。

我們應該肯定，聲調在漢語中是客觀存在的，是漢語語音中的一個很突出的特色，它具有區別意義的作用；在漢語語音的發展上，聲調也佔有極重要的位置；各方言的調值雖然區別較大，但是調類則有其共同性，在語音的規範化中忽視聲調是不應該的。

近年來複音詞大量增加，聲調在區別意義上的作用也許沒有以前大了，但是它仍是漢語的特色之一，它在漢語語音的發展上仍佔着重要的位置，漢語的發展歷史告訴我們聲調並不會逐漸衰亡下去。如果對聲母和韻母已有了很完善的規範而聲調任其自流地發展，其結果勢必影響到聲母、韻母，而使原有的規範陷於混亂與分歧。我們應該注意到在漢語發展歷史中聲調和聲母、韻母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要求人為地制止這種關係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只孤立地看聲調在區別意義上的作用而忽視了它在語言發展中的作用。

聲調在語音規範化中的重要作用是必須肯定的。至於在拼音文字中應該如何表示聲調那是技術性的問題，技術性問題是不能和原則性問題混在一起的。如果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就要改變原則，那就是本末倒置。

兒化問題在語音規範化或拼音文字中並不嚴重，能夠區別意義的兒化詞（如“白面：白面兒”）在整個兒化詞中究竟還佔少數。就目前產生新詞的情況來看，兒化在區別意義上的作用並沒有什麼發展，很少有新詞是用兒化的辦法產生的。一般說起來，學習有區別

意义作用的兒化詞並不困难，困难倒在於那些在北京方言中大量存在而區別意义的作用比較小的兒化詞（如“电影：电影兒”）。实际上这些詞是否應該兒化是作者自己的風格問題，不必强求一致。一个能說純粹北京方言的人运用兒化的程度也要依語言环境而異，何况在加了工的文学語言中。

在討論語音的規範化時，我們不能忽視目前廣播、戲劇、电影等等在語音規範化上打下的良好的基礎，撇開这基礎而想要另起爐灶是一定行不通的。只有根据这个基礎來製定語音的規範和拼音文字才是切实可行的，才是廣大人民羣众所能接受的。

其次談現代漢語文学語言中的語法規範化問題。

語法構造最穩定，各方言之間語法的分歧也最小，一般說起來，在文学語言中，語法的規範化問題應該是比較不嚴重的。但是，就漢語的目前情况來說，語法規範化問題又有其特殊的地位。直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沒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意見一致的現代漢語語法系統，这就給語法的規範化帶來了一定的困难。目前首要的任務就是根据歷史發展來找尋漢語語法的規律，有了規律，談規範化才不至於落空。

目前語法學家對語法系統雖然還沒有完全一致的見解，不過對哪些句子通，哪些句子不通，看法基本上還是一致的，而且在解釋某一个具体句子為什麼不通時，術語儘管用得不同，意見還沒有什麼分歧。但是，如果以文学語言規範化來要求，則只停留在“通”或“不通”的階段是遠遠不夠的，“通”的句子只說明漢語裏允許這樣說，這種說法是否為文学語言所容納而成為全民語言的規範則是另外一個問題，而這正是我們過去注意得不够的問題。

目前對語法的規範化似乎首先應該注意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方言土語（尤其是作為基礎方言的北京方言）的一些特殊語法形式應該如何處理？“唱的唱歌，跳的跳舞”的格式存在於一些方言中，這種句子在日常會話中是通的，但是我們是否認為它合乎文学語言語法的規範而吸收進文学語言中去？

二、由翻譯作品的影響所產生的一些特殊語法形式應該如何處理？哪些格式合乎漢語語法發展的趨勢而把它肯定下來（例如“化”“性”“者”等詞尾性成分的大量應用）？哪些格式不合漢語語法發展的趨勢而不能把它吸收進文学語言裏去（例如冗長的修飾語）？

三、有些古代漢語裏的語法形式目前已不存在於口語裏，可是由於書面語言的影響，到現在還大量存在於書面形式的文学語言裏，例如“寫於深夜裏”、

“致以深切的敬意”等等。這些從古代吸收來的語法形式哪些合乎規範，哪些不合乎規範？

嚴格地講，不同的語法形式一般都能表達出不同的思想感情。在確定語法規範化時，似乎不宜於強調語法形式不應該重複而只由这方面加以規範，樣就很容易削弱了文学語言在語法形式的表達上的富性和靈活性。

語法的規範化在文学語言中雖然不是最嚴重的問題，但在具体解決時却是一個最困難的問題。我們切希望語法專家們能夠共同編寫出一部規範性的法，這樣一般人在运用文学語言時才可以有所參考而研究語法的人也可以根據規範性的語法分出主重，逐步解決語法上存在的問題。

最後談現代漢語文学語言中的詞彙規範化問題

在語言發展中詞彙發展得最快，各方言間詞彙分歧也比較大，因此文学語言中詞彙的規範化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全國解放以後，地方割據局面已經完全消除，地區經濟和文化的關係空前密切，新詞產生的地域也隨着顯著地比過去減少了，各方言在詞彙上的分歧已不像過去那樣嚴重，像過去帶有濃厚方言色彩的州話的“土担”“恤衫”這類受外來語影響產生的新詞已逐漸為“郵票”“襯衫”所代替；同是“輪船”，在廣州叫“火船”，在福州叫“車船”的現象也逐漸減少。這方言性很濃厚的新詞註定了不能再發展下去。全國真正統一已為詞彙的規範化準備下了良好的條件。

詞彙的規範化主要就在於減少各方言間用詞的分歧，使各方言的詞彙能逐漸趨於統一，有用的方言詞語應該逐漸被文学語言吸收，沒有用的應該逐漸淘汰。如果各方言的詞彙能夠趨於統一，對於語音規範化和語法的規範化都會有很大幫助的。

詞彙的規範化自然不是限制詞彙的發展，也不限定了詞的詞義不讓它變化，如果把每一個詞義固定住，實際就等於讓詞彙僵死不動，而這是實際上不可能的。詞彙的規範化更不是限制新詞的產生，只有新詞不斷產生，文学語言才能逐漸地豐富起來。詞彙規範化的主要作用就在於使新詞的產生有定的規範，具體地說，也就是新詞的產生首先要合語言的傳統，其次要能普遍為人所理解，最後，還能夠為作品的内容服務。

為作品的内容服務這一點在詞彙的規範化中其特殊的意義，這說明詞彙的規範化必須顧及文学語言（尤其是文学作品的語言）風格的多样性。因此，一般詞彙方面，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可以有權利超出



語言的範圍適當地使用一些方言土語或其他成分。有在活的人民的語言基礎上給予作家充分創造新詞能力，文學語言的詞彙才能得到極大的發展。

文學語言和方言的複雜關係在詞彙的規範化中反映得最明顯。由文學語言總的原則來看，詞彙的規範化似乎首先應該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問題：

一、詞彙的規範化不能只由是否存在於現在的口中來決定。如果只用口語來衡量，那就無異於限制詞彙的發展。例如“圖表”“紙張”這些文言性的詞語最並不存在於口語中，可是我們已經把它吸收到文學語言中來。又如“父親”“母親”這些詞可能並不存在於何方言土語中，各方言的說法也極不一致，但是我們仍然應該把它算作合乎規範的詞。這是否會同原來語中存在的“爸爸”“媽媽”重複呢？不會的。“父親”“爸爸”雖然是同義詞，但是具有不同的意義色彩，就是說一部分詞容許有書面上和口頭上不同的專門用的場合的。同義詞的存在是豐富語言詞彙的主要方法之一，如果不允許語言中同義詞的存在，語言的詞彙就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

二、如果在同一方言中並行存在着兩個意義完全等的完全同義詞，而它們的分別只在於方言性的大時，這種重複就是完全不必要的，因為這種重複的除了方言性以外並不能表達出任何不同的思想感情。這就必須在二者之間選擇合乎語言傳統的和有普遍的作為規範。這情況在北京方言中尤為重要，因為北京方言是選擇規範化詞彙的主要根據。例如在北京方言裏，“星期”和“禮拜”、“日曆”和“月份牌”、“火”和“取燈兒”同時並存，這就必須選擇“星期、日曆”和“火柴”作為規範化的詞。但這並不表示禁止使用方言比較濃厚的同義詞，在表達一定的語言風格或方言色彩，能為作品的内容很好地服務時，這些詞在文學作品中仍是可以用到的。甚至可能由於文學作品的運

用，這些詞逐漸變成非完全同義詞，具有了不同的意義色彩而為文學語言所吸收。另外有一些完全同義詞如“代替”和“替代”、“糧食”和“食糧”、“靈魂”和“魂靈”，連方言性的差別都沒有，那就更需要從其中選擇一個作為文學語言的規範了。

三、如果不同的方言對同一個詞有不同的說法，那麼首先應該考慮的是北京方言，例如“太陽”有許多方言叫“日頭”，“他”有許多方言叫“伊”，這都必須以北京方言為準繩而不能機械地比較用哪一個詞的方言多。否則詞彙的規範化將陷於混亂，而北京方言也就失去了作為基礎方言的資格。

我們必須根據漢語詞彙發展的一般趨勢和內部規律來確定文學語言詞彙規範化的原則，再根據這些原則編寫出一部規範性詞典，這個工作在目前已是迫不及待的了。

由文學語言的規範化問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所謂規範化就是要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發揮我們的“主觀能動性”，使語言能夠按照它自己發展的規律更迅速地向前發展，從而促進文化的發展。但是我們千萬不可以把“主觀能動性”了解為“主觀隨意性”，毛主席教導我們：“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⑦。”如果對我們語言的發展規律還沒有具體地分析，就想確定語言的規範應該怎樣，不應該怎樣，以為憑自己主觀的力量就能把語言的發展導向自己創造出來的“規範”，而認為這就是發揮自己的“主觀能動性”，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它將給漢語的規範化帶來極大的妨害，這是我們進行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時所應該隨時警惕的。

⑦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2卷，783頁。

# 談談聲調問題

喻世長

漢語和漢藏語系的其他語言都是有聲調的語言。在有聲調的語言裏，聲調是詞彙的要素之一，換句話說，每個詞都要有它固定的聲調。如果一個詞是一個音綴，這一個音綴要有固定的聲調；如果一個詞是兩個或更多的音綴，每一個音綴都要有固定的聲調。

人人都知道，構成一個詞，有義和聲音兩方面，或說詞義和語音兩方面。詞的聲音，又可以進一步分析。通常分為輔音和元音兩類。在漢藏語系諸語言裏，分析一個詞的聲音時，在輔音元音之外，必須注意語音方面另外一個必不可少的因素——聲調。在漢藏語系諸語言裏，任何一個詞，如果不按照這個語言或方言的語音系統所規定的聲調去發音，雖然輔音元音都讀得正確，也還是沒有意義的。換句話說，要用聲音表達一個詞的意義，輔音元音和聲調這三種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例如：

漢語北京話 pa<sup>1</sup> (八) pa<sup>4</sup> (拔) pa<sup>5</sup> (把)  
pa<sup>5</sup> (霸) 都有意義，但是 pa<sup>1</sup>  
沒有意義。

苗語石門坎方言 la<sup>1</sup> (免子) la<sup>4</sup> (投) la<sup>4</sup> (伸入)  
la<sup>4</sup> (罵) la<sup>5</sup> (別人) la<sup>1</sup> (也)，  
la<sup>5</sup> (喜歡) 都有意義，但是  
la<sup>5</sup> 沒有意義。

佈依語望漢方言 na<sup>1</sup> (厚) na<sup>1</sup> (田) na<sup>1</sup> (臉)  
na<sup>4</sup> (舅) na<sup>4</sup> (箭) na<sup>4</sup> (獺) 都  
有意義，但是 na<sup>5</sup> 沒有意義。

用這個語言或方言之中所沒有的聲調來發音，不能代表任何意義，和用這個語言或方言之中所沒有的輔音或元音來發音，不能代表任何意義，在道理上是一樣的。由此可見，在分析漢藏語系任何一種語言或它的方言的語音結構時，都要把聲調和輔音元音同等看待。如果我們把輔音和元音看成是語音結構當中主要的成分，把聲調看成是次要的成分，甚至是可有可無的成分，那就是對於漢藏語系語言的本質沒有認識清楚。

因為聲調是漢藏語系諸語言的語音結構當中主要的和本質的因素之一，所以在語音的歷史演變過程中，聲調也起着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聲調是作為語音的有機構成的一部分。要研究語音的發展，不能不

分析聲調的條件；甚至可以說，如果撇開了聲調，藏語系諸語言的語音歷史發展，就是不可認識的。

比方漢語北京話 p, t, k 等聲母拼出來的字，凡是鼻尾音 n, ŋ 的都不可能有陽平調的字，這是因為 p, t, k 等聲母拼出來的字念陽平調的字都是由古代聲字變來的，入聲字只變成不帶鼻尾音的韻母，不成帶鼻尾音的韻母。

又如佈依語鎮寧方言 f, θ, x 三個聲母，只出現陰類調，v, δ, γ 三個聲母只出現在陽類調（這個方陰上和陽上调值沒有分別）；可是貴筑方言，不管陰調，一律讀 v, δ, γ。因此我們可以假定佈依語在古代有一個時期，摩擦音聲母的字，只有四個調類，是每一類的聲母都分清濁。

又如苗語石門坎方言的陽上调字和陽去調字的母完全是濁音，在四川珙縣的苗語方言中，這兩個字的聲母也都是濁音，這充分說明聲調跟聲母是有機聯系的，聲調並不是人們隨意選擇的標識，本身也不模糊，相反的，它有它的歷史根源，並且在還正在以極大的活力存在於我們的語言裏。

聲調不但在語音演變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方言的比較研究當中也佔着重要的地位。從實用的觀點看，我們指導說不同的方言的人互相學習，指導說種方言的人學習標準語，都要藉助於聲調來說明學的方法。

比方我們告訴無錫人學北京話時，要把陽上（以音邊音為聲母的除外）陰去陽去三類調子的字都讀相同的高降調。告訴廣東人學成都話時，把帶 -p, -t, 韻尾的入聲字，都讀低降調，去掉 -p, -t, -k 韻尾。

我們還可以告訴龍津僮人學武鳴僮話時，把陰調的聲母 k' 改讀為聲母 h。告訴貴筑佈依人學鎮寧依話時，把陰類調的聲母 v 改讀為聲母 f。

我們還可以告訴石門坎的苗人學四川珙縣苗時，把陽平調的送氣濁聲母改讀為純清聲母，把陽調的純濁音加上送氣成分。

由此可見，在漢藏語系語言裏面聲調決定着語音的演變，也決定着方言的特點（如說某某方言保存



子)。語言學家如果撇開聲調，研究工作就很難進行。一般羣衆學習語言(學習標準語或某一方言)，如果注意聲調的規律，也就要事倍功半。事實上，人們學習時也是不知不覺地藉助於聲調的規律的。

在聲調的認識上有一個問題應該加以說明，那就調類和調值的區別及聯繫的問題。普通我們說某某音或方言有幾個調子，那就是說在聲調的類別上可區分為幾類。每一個調類所包含的音綴有共同的並是一定的高低升降的讀法。音綴的高低升降的讀法是調值。可以說調類是通過調值來表現的。我們在考一個語言或方言時，主要的是考察它的調類。比方，我們說漢語北方話大多數是四個調子，那就是說漢語北方話大多數是四個調類：平聲分陰陽兩類，上去各類，入聲的調類已合併到其他調類中去了。也就是漢語北方話各個方音在語音發展階段上，聲調的發情況是大體一致的。至於調值，也就是這四個調類具體形式，各個方言是很不同的。同是一個陰平調，京讀高平，天津讀低平。可是我們在研究聲調時所注意的是，北京讀高平的字，天津是否都讀低平。如果有少數字不是這樣，要考察出這種差異的原因或條件。

又比方佈依語。我們說鎮寧方言把陰上陽上合併，這句話對於任何能分別陰上陽上的方言都是有效，不管那個方言陰上或陽上實際的調值怎樣。

再如苗語石門坎方言把陽上調的名詞併入陰去，陽入調的名詞併入陽去，陽去調的動詞併入陽入。一個說着保存原來調類的苗語方言的人看來，石門坎方言的變化，也是有一定條理的。

照前面所說，聲調既然是十分固定的，在實際讀音的時候，聲調是不是絲毫沒有變化呢？不是的。

先舉漢語北京話的例子。比方兩個上聲的音綴連一個詞時，前一個上聲要變得近於陽平。例如“老虎”讀得好像“勞虎”，“粉筆”讀得很像“墳筆”。又如數“一”在和陰平陽平和上聲連接時讀去聲，如“一張”“一本”，讀起來好像“意張”“意頭”“意本”。可和去聲連接時，“一”字讀得很像陽平，像“一頓”好像“移頓”，“一個”讀得好像“移個”，“一看”好像“移看”。

再舉石門坎苗語的例子。石門坎苗語有修飾關係連起來的時候，常常發生變調現象，尤其是陰平

陽平調的字在其他調的字的後面時，其他調的字差不多都變調。陰平陽平調的字後面接陽平調字時，後一字變陰平；接陰上調字時，後一字變陰去；接陽上調字時，後一字變陽去；接陰去調字時，後一字變陰入；接陽去調字時，後一字變陽上；接陽入調字時，後一字變陽上。

是不是說，因為有了這種聲調的變化，就說明聲調是隨意的，是混亂的，是可有可無的呢？不，恰恰相反，這種變化是有嚴格的規律的。也就是說，聲調的變化是有一定條件和範圍的。不是混亂的不能掌握的。

有一個問題應該不在我們討論之列。那就是不同的詞，聲母和韻母相同，只有聲調不同，在寫漢字時寫成同一的形式，像“看見”的“看”和“看守”的“看”，名詞的“釘”子和動詞的“釘”。因為有人受了漢字的迷惑，想舉這方面的例子來說明聲調的變化是不規律的，所以這裏附帶說明一下。自然由聲調所引起的語詞分化，那是一個值得專門研究的問題。

現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裏面，有五億數千萬人說着有聲調的語言，可是我們有許多人對於聲調的認識是不充分的或錯誤的。過去關於聲調的研究，偏重於發音學上或物理學上的原理的闡發，那是必要的。因為有了那些研究，才使我們從“平聲平道莫低昂……”的迷團中走了出來。但這是不夠的。我們要接受斯大林同志的語言學說，要深入問題的本質，要從語言的特徵上，也就是從構成詞的要素方面去認識聲調，從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上去認識聲調。只有對於聲調有了正確認識之後，才能討論當前一個重大的問題——漢字拼音化問題。

有些同志不願意這樣做。把文字的拼音方案 and 對語言的實質的研究割裂開來。他們說研究聲調的規律是少數語言學家的事，至於為大眾所應用的拼音文字，可以不管聲調方面的問題。還有人為了給他自己的拼音文字不標聲調的主張找“理論”根據，有意或無意地，把聲調方面的主要問題——調類問題避開不談，說什麼北京話的聲調不好學；對於聲調的有規律的變化不肯去接觸，卻抓到幾個個別的讀音不十分固定的漢字，做出聲調難於掌握因而在拼音漢字中可以不表示聲調的結論。我認為如果這樣做，會把漢字拼音化的工作帶到彎路上去。希望多有一些同志參加，審慎地討論研究這一個問題。

# 批判胡适反动的语言学观点

殷德厚

胡适不仅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也不仅在哲学、文学、历史这些科学当中散佈了資產階級的实用主义的反動思想，就是在語言学中他也散佈了同樣的反動思想。虽然胡适正面議論語言的文章不很多，但他还是利用了語言科学的陣地惡毒地陰險地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同時，胡适之流的反動思想餘毒一直也沒有很好地清洗。因此，批判胡适派反動的語言学觀點以及清除他們遺留下來的毒素，是很有意義的，是完全必要的。

胡适在語言学中的反動思想極其嚴重，这是肯定的；但是这种反動思想表現在各個方面，而且是比较隱晦的，因此，要作有系統的全面的批判还要繼續努力。本文只試圖从“胡适对語言本質的个人主义觀點”、“胡适对語言發展的主觀唯心主义觀點”、“胡适对語言与客觀世界的關係的反動謬論”、“胡适对祖國語言的蔑視”这四方面对胡适反動的語言学觀點進行批判。不妥之处一定很多，希望專家和讀者指教、批評。

## 胡适对語言本質的个人主义觀點

我們日常生活离不开語言，这是現在誰也知道的事实，但是对語言的了解，特别是对它的本質的了解，資產階級語言学者与馬克思列寧主义語言学者則是完全不同的。馬克思列寧主义語言学者認為，“語言的本質是社会的。这本質決定於語言的社会職能：作为交际、交流思想和相互了解的工具”<sup>①</sup>。列寧在《論民族自決權》一書中寫道：“語言是最重要的人類交际工具”。斯大林在闡說語言的社会本質時，給語言下了經典性的定义：“語言是工具、武器，人們利用它來互相交际，交流思想，達到互相了解”<sup>②</sup>。他同時指出：“語言是屬於社会現象之列的，从有社会存在的時候起，就有語言存在。語言是隨着社会的產生而產生，隨着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的。語言也將是隨着社会的死亡而死亡的。社会之外，無所謂語言”<sup>③</sup>。列寧斯大林的話清楚地告訴了我們：語言是社会中人與人之間的交际工具，它是社会集体的財富，因此，它的本質是社会的，而不是个人的，也就是說語言不是个人隨意表達思想的东西。但是，資產階級語言学者則不然，他們

或是把“言語”和“語言”兩者对立起來，認為語言的質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或是簡單地把語言看是一种个人的表達思想的工具。前者以西歐語言学德·索緒耳一派为代表，他們認為“在言語裏，沒有麼是集体的，它的表現是个人的和暫時的”，而語却是“言語行为的社会部分，是个人以外的东西”，为“語言与言語有區別，它是我們可以分開來研究的象”<sup>④</sup>。很明顯，他們把“言語”和“語言”截然分開了，實質上也就是強調了个人的作用，否認了語言的社會性。後者是大多數資產階級語言学者的主張。自从世紀德國語言学家洪波耳德提出語言是“思想的表現”的口号以後，西歐資產階級学者多採取他这种說法，如高本漢在論到漢語時，只單純說語言是“一种表達思想的工具”<sup>⑤</sup>。中國以前受資產階級影响的一些者也抱着同樣的觀點。沈步洲在1931年所著《語言概論》中說：“凡披露思想會得表彰者，皆可謂之語”。這裏可以看出，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資產階級語言学者都抹殺了語言的社会本質，而把它看作是種純屬於个人的东西。当然，这是与他們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的立場緊密地联系着的。

胡适是資產階級御用学者，極端崇拜高本漢，他对語言本質的了解也与上述等人毫無二致。依他之說來，語言的本質就是个人的，而抽去了主要的即社會的意義。

他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表情達意”，並說他“嘗說：‘語言文字都是人類表情達意的工具：表達得好，表情表得妙，便是文學’”<sup>⑥</sup>。早期他極力主張“活文學”，高喊用“白話”，原因也只是“死文學”“文言”都不能表情達意了。当然这是很明顯的謬論。在這裏，他一方面把作为交际工具的“語言”和屬於上层建築的“文學”混為一談（這一點下面還要談到），一方面站在資產階級反動立場來曲解“語言”和“文學”。

① 契科巴瓦：《語言学概論》第一編上册。周嘉桂譯。

②③ 《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学問題》20頁，人民出版社。

④ 德·索緒耳：《普通語言学教程》。

⑤ 高本漢：《中國語與中國文》，張世祿譯。

⑥ 胡适：《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存》，集（一）。



“語言”“文學”看作只是個人表情達意的東西。表面來，說“表情達意”並沒有什麼不對；實際上，他說“表情達意”，只是指說話的人心裏要怎麼表達就怎麼表達，而不是說人與人互相間表情達意的。不過，胡有時也會打出一些幌子來蒙蔽人家，比如在《國語法概論》<sup>①</sup>中，他就說得“婉轉”多了，他說：“語言文的用途很多，簡單說來，（一）是表情達意，（二）是載人類生活的過去經驗，（三）是教育工具，（四）是類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這乍一看來，似乎胡適知道語言有一個功用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但我們只要仔細分析一下，便不難了解他的計。應該指出，胡適在這裏並沒有說語言不是“表情達意的”，相反地，實質上倒是首先把這一點肯定了下來，而語言“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在胡適看來是不足輕重的，因為胡適在《論句讀符號》<sup>②</sup>中清楚地告訴我們：“文字的第一作用便是達意”，而且他常說“一切語言文字的作用在於表情達意”，而像上這種說法只不過是偶爾一次罷了。同時，胡適又說“文學不過是最能盡職的語言文字，因為文學的本作用（職務）還是‘達意表情’”<sup>③</sup>。這裏雖然沒有正說語言文字，但胡適的意思很清楚，語言文字的基作用顯然是“表情達意”。（同時，在後面對胡適的論中，也可以看到他是抹殺語言的社會本質的。）由可見胡適不是要貶低語言的交際作用，就是要在“語言是人類共同生活的唯一媒介物”的煙幕下，把“語言、文字是表情達意的工具”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觀點偷過來，就是要扼殺語言的社會本質。

應該說明，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是鞏固思想的工具，是交際的工具，並不否認語言的表達職能，也不否認語言有表情達意的作用。馬克思主義語言學認為語言的交際職能與表達職能不是對立的，而是統一的，表情達意也是為了交際。所以，語言的交際職能是根本的、主要的，而表達職能是從屬的。但是，胡適的說法剛好相反，他認為語言的表達職能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而交際職能則無足輕重。這就是他的唯心思想、個人主義觀點的表現。

必須指出，胡適不只是給語言下了這麼一個定義，說表情達意的工具，他還有比較具體的一些看法。這裏面，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胡適是存心扼殺語言的社會本質，是存心宣揚他的個人主義觀點的。在胡適看來，當時社會上的老百姓雖然都會說“白話”，可是似乎都不算“白話”，“白話”既不是全民的交際工具，也不是全社會的產物，而只是某幾個團體運用某幾本書上記載的東西似的。他在《建設的文學

革命論》上說：“試問我們今日居然能拿起筆來做幾篇白話文章，居然能寫得出好幾百個白話的字，可是從什麼白話教科書上學來的嗎？可不是從《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書學來的嗎？”難道真是這樣的嗎？我想恐怕誰也不會同意這種說法。我們只要反問一下：難道當時一般人能講滿口的白話，也是從《水滸傳》等書學來的嗎？或者是從說書人那裏學來的嗎？大概只有胡適自己是這樣的！不過胡適是狡猾的，他在談到自己時，確實不敢這樣“直率”“大膽”。他在《國語標準與國語》<sup>④</sup>中介紹自己學國語的經過時說：“我的國語（按胡適所說的國語就是白話，胡適在《答朱經農》<sup>⑤</sup>一文中說，“我所主張的‘文學的國語’，即是中國今日比較的最普通的白話”）大半是在上海學校裏學的，一小半是白話小說教我的，還有一小部分是上海戲園裏聽得來的”。在這裏它打了一個大大的折扣，只敢說一小半是白話小說教的了。但是，那怕作了這麼大的修正，我們還是看得出他否認語言社會性的個人主義思想的。我們要問：是不是除了白話小說，除了學校，戲園，我們就接觸不到“白話”呢？其他地方就不通行“白話”呢？難道胡適從小在家裏說話也是滿咀“文言”嗎？難道他跟一般人講話也是“之、乎、者、也”嗎？

在胡適看來，語言（包括書面語）只是某幾個文學家或者是某個文學家造的，當時的白話只來源於過去的書面語。在胡適前面所說的話裏，已經可以看出這種思想。胡適認為《水滸傳》等作者能夠造語言，當時大家所說的白話，都是從他們那兒學來的。不僅如此，胡適還有更明顯的說法。他說：造中國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國語的人<sup>⑥</sup>，又說我們今天所用的白話，都是《水滸傳》等書“定下來的”。可以看出，胡適一方面主張個人造語言（這一點下面還要作系統的批判），另一方面把白話的源泉歸之於《水滸傳》等書，說什麼是由它們定下來的。其實《水滸傳》等書所用的語言（書面語）是那時加了工的人民的口語，決不是什麼個人的獨特的語言。當時的白話，其實是由明清語言發展而來，

① 《胡適文存》第一集（三）。

② 《胡適文存》第一集（一）。

③ 《中國新文學大系》，《什麼是文學》。

④ 見《新教育》3卷1期。

⑤ 《胡適文存》第一集（一）。

⑥ 《胡適文存》第一集（一）。

決不應只說是來源於《水滸傳》等書，雖然這些書對後來的語言是有影響的。由此可見，胡適有這些謬論是由於否認語言的社會性和宣傳它的個人主義觀點。

必須指出，胡適否認語言（白話）是社會的交際工具，誇大某些文學作品的作用的思想和他主張語言是表情達意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因為他主張語言只是表情達意的，所以他以為自己所說的“國語”（白話）不是全社會的話；因為他主張語言只是表情達意的，所以他片面誇大《紅樓夢》等書的作用，說當時的白話是這些書定下來的。顯而易見，胡適就是用這些胡說來否定語言的社會性，就是要用這些胡說來宣揚他在語言學上的個人主義觀點。

為了批判語言是表情達意的錯誤思想，為了更清楚地說明語言的社會本質，我們不妨拿平時運用語言的情況來加以說明。我們把“桌子”叫做“桌子”，而不叫做“書”，也不叫做“сто́л”，這並不是因為發“桌子”音比發“書”，發“сто́л”音難，也不是別的原因，而是因為語言受社會的規定。在說漢語的社會裏，大家把“桌子”叫做“桌子”，所以我們也不能例外；如果我們把“桌子”叫做“書”或“сто́л”，別人便不懂了。這樣，也就失去了語言的交際作用。

書寫的语言也是為了交際的，因此，也有強烈的社會性。而且行文時更要力求曉暢，因為對話者（聽者）不在眼前。甚至個人在房中自言自語（即獨白）時，也不能隨意來表達思想，所運用的語言也有社會性。因為自己要講給自己聽，若獨白時不遵守社會的習慣，那自己也會“莫知所云”了。

由此可見，無論在說話，寫作，獨白時，人們不能為了表達個人思想而隨意運用語言，不能創造某種特別的，個人的語言。不管在什麼時候，什麼場合下，語言都不是個體的，都是社會的。契科巴瓦說：“作為交際工具的語言是人類集體創造的，是為集體而創造的。個別的人既不能創造語言，也不能隨心所欲任意運用現有的語言事實，語言不是個人的現象，而是社會的現象”<sup>①</sup>。

顯而易見，胡適抹殺語言的社會性，把語言看作是個人表達情意的工具的个人主義觀點是極端荒謬的，是站不住腳的。從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胡適誇大表達的作用，是為了抹殺語言的社會性，是為了宣揚他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觀點。應該說明，胡適這種反動觀點並不只是表現在這裏，在下面幾個問題裏，同樣也表現出來了。因此，我們對他抹殺語言的社會性一點，必須作進一步的批判。

## 胡適對語言發展的主觀唯心主義觀點

跟胡適把語言看作是表情達意的個人主義觀點一致的是他的主張“造國語”，主張“改造適用的語言”主張“創造發明”一些新語法。胡適的這種主張實際也就是否認了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否認了語言的社會性，也就是胡適的個人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實踐的一種表現。

什麼是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呢？那就是有關語言本身的一切規律。如詞彙、語法、語音以及詞和句的意義等各種各樣的有規律的變化都在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項下。語言學的主要任務就是要研究語言的這些內部規律。而研究語言如何隨着基礎發展，研究語言如何隨着上層建築發展，或者研究個人如何創造語言或改造語言，這都只能使我們對語言的了解出錯誤的結論。

胡適完全持着和馬克思主義對立的觀點。他主張個人“造國語”，“改造適用的言語”的。當然他研究了一些“國語文法的通則”，但是他把它說成是“語言的變化”，就說明了他實際無意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

胡適有時也說語言的演化，也說這種演化是“尋常百姓”的功勞。雖然如此，他否認語言的社會性，否認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的思想卻是一貫的，並沒有絲毫的改變。他在《國語文法概論》中說：“國語的演進全是這幾千年‘尋常百姓’自然改變的功勞，文人法學者全不會過問。我們這班老祖宗並不會有意創造文法，只是文法不知不覺的改變了……因此我們這種玄妙的變化，不能不脫帽致敬，不能不叫一聲‘民族的常識的結晶’！”<sup>②</sup>在同一書中，他又說：“文字的自然變化是無意的，是沒有意識作用的，是莫名其妙的”。

那末，我們要問，這種改變是怎樣來的呢？是語言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呢？是不是語言隨着它的內部規律變化的呢？顯然，胡適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認為語言是“尋常百姓”自然改變的，這種改變是玄妙莫測的，是“莫名其妙的”。這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的不可知論，但是這種不可知論，卻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改造語言的思想。胡適把從前語言的改變說成玄妙莫測的，這樣他才能順利地提出個人改造語言

① 契科巴瓦：《語言學概論》第一編上冊。

② 《胡適文存》，第一集（三），重點是我加的。以未註明的重點均為筆者所加。



調。

胡適雖然也談了些語言改變的不可知論，但改造語言的調子却彈得更高。下面我們就來听听他的這種調。他在《建設的文学革命論》中說，“國語不是單靠他語言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這似乎說得很正，看來胡適是反對造國語了！如果我們這樣想就落他的圈套，其實他是主張“造國語”的。就在同一個地方，他高喊“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学。有了國語的文学，自然有國語”。緊接着胡適作了一番解釋，意思是：他決不反對造國語。恰恰相反，他是極力主張造國語的，只是覺得“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固然要緊，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学；便是國語的小說，論文，戲本”。這個解釋再明白不過了：他說，他是主張造國語的，但是造國語必須選擇一種“利器”，“文学”正是造國語的“利器”，所以“國語”只有通過這種“利器”才能造得成。注意：他完全撇開了說語的人民了！也就是不承認文学語言由人民語言加的意思。有人也許會說，胡適只主張用“文学”來“造語”，他不是主張個人造國語的。要不，他怎麼說語不是單靠幾位語言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如果有這種問題的話，那我們就請胡適來回答好。胡適在《建設的文学革命論》中又說：“沒有一種語是教育部的老爺們造成的，沒有一種是語言學專家造成的。沒有一種不是文学家造成的。”胡適還說，別人不相信，於是他的歷史癖又發了：“總而言之，今天所用的‘標準白話’，都是這幾部白話的文学（《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殷註）下來的”。因此，他得出結論：“造中國將來白話文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胡適這種主張個人語言的思想難道還不明顯嗎？我看已經是露骨之至了。胡適為什麼有這樣的主張呢？他也隱隱約約地吐露出來了。他常問他“自己道：‘自從施耐庵以來，很有些極風行的白話文学，何以中國至今還不曾有一種標準的國語？’我想來想去，只有一個答案。這一來，中國固然有了一些有價值的白話文学，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胆的主張用白話為中國的‘文’造國語’”。①。言下之意，光用文学造國語還不能成，還要“有一個人出來明目張胆的主張”。由此看來，製定標準國語的是文学家，而且還是敢於明目張胆提出主張的人。那末，誰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在胡適看來，當然是胡適自己。因為他雖知不是語言學專門家，但他却自以為是“造白話文学”的

人，自以為是“提倡白話文学”的人。可見他的主張帶有極其鮮明的個人目的。

必須指出，胡適這種個人改造語言的謬言，決不只是在某一篇文章中才能聽到，類似的調子在別的文章裏也有。胡適在《答藍志先書》②中說：“中國俗話不發達”，“我們現在的要務”，便是“全在改造適用的言語”。他談論國語文法時說：“從《論語》到現在，中國的文法也不知經過多少的大改革！”

胡適除了這些抽象的議論之外，還有改語言的具體辦法。最主要的是“設法把複音會字大造特造”③。原因是單音節字易消滅，“而複音會字不容易消滅”。在他看來，“俺們”代替了“俺”，“我們”“你們”代替了“我”“你”就是證據（其實“俺”“我”“你”並沒有被“俺們”“我們”“你們”代替，它們仍然保留在我們的語言裏。同時，它們是兩組意義作用各不相同的詞）。

應該說明，複音節詞在現代漢語中漸漸增多了，如收音機，腳踏車等，而且還可能繼續發展下去，這是語言按照它的內部規律隨着社會發展而發展的表現，決非某個人或某幾個人創造或改造出來的，更不是按照胡適的反動觀點創造或改造出來的。

胡適把語言看作是可由他任意擺佈的東西，他愛怎麼造就怎麼造，愛怎麼改就怎麼改，完全抹殺語言的社會性與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這種觀點當然是主觀唯心主義的觀點。不過他這種反動觀點不是憑空掉下來的，它有實用主義理論作基礎。

胡適在宣傳實用主義時就明白地告訴過大家：“真理原來是人造的。是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來供人用的，是因為他們大有用處所以才給它們‘真理’的美名的。我們所謂真理原不過是一種工具”④。（關於實用主義的理論的荒謬，報刊上批判的已經很多，我不在這裏重複了）。胡適這種思想用到語言裏，那必然會得出個人造語言，個人造語言的規律，語言本無它發展的內部規律的謬論。這種謬論當然同樣是反動的，因為它否認了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也就否認了語言學本身。這樣一來，語言將極其混亂，它就不可能成為社會的交際工具。直至現在漢語中呈現一些混亂的現象，我想是受了胡適這派反動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影響。因此，今天肅清這種影響是很有意義的。

①② 《胡適文存》第一集（一）。

③ 《同音字之當改和白話文之經濟》，《新青年》6卷6號。按“複音會字”即複音節詞。

④ 《胡適文存》第一集（二）：《實驗主義》。

## 胡適對語言與客觀世界 的關係的反動謬論

前面已經說過“語言是最重要的人類交際工具”，既然是交際工具，那麼這種交際的作用是怎样實現的呢？誰也知道是用交換思想的方式實現的，但是思想不能赤裸裸的存在，當然，思想也不能赤裸裸的交換。只有通過語言才能表達出來。也就是說，人們交際時，只有通過語言交流思想，才能達到相互了解。所以馬克思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斯大林說：“思想的真實性是表現在語言之中”。斯大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還告訴我們：“語言是思想的物質外殼”。由此可見，語言和思想是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

因此，在批判胡適對語言與客觀世界關係的反動見解之前，應該首先檢查一下：胡適是怎样了解思想和客觀世界的關係的。

胡適在介紹杜威對思想的認識（也就是敘述他自己對思想的認識）時說：“我們可以把思想的層次畫一個略圖”<sup>①</sup>，就是這樣的略圖：



胡適在這裏清楚地告訴我們兩點：第一，思想產生於暗示；第二，思想是解決困難，總之思想不是反映客觀的。

對此，必須作兩點分析。首先，要研究胡適的所謂“暗示”究竟是什麼，其次要分析“思想是解決困難的”意味着什麼。什麼是“暗示”，其實胡適有明確的答覆，他說：“暗示”是“湧現的”，是“自然湧上來，如潮水一樣，壓制不住的；他若不來時，隨你怎樣搔頭抓耳，挖尽心血，都不中用”<sup>②</sup>。不言而喻，這種“暗示”不是胡適的“心血來潮”，不是詹姆士的“媒婆”，就是貝克萊“大主教”的“神”了；決非客觀存在的物質。可見，胡適所謂的思想只是純粹精神的东西，決不是反映客觀存在的。其次我們要分析為什麼胡適等人認為動作感困難時才有思想，也就是要分析“思想是解決困難的”意味着什麼。胡適之流是實用主義者，在實用主義者看來，思想是“有用的”也就是“實用的”。因此，“思想”是不是客觀的，可以不管，只問它對實用

主義者有利還是沒有利；如果有利，則歡迎，無利則反對。他們認為思想必須在解決主觀的困難時才產生，思想不是客觀事物在人腦中的反應，這種就是頭徹尾的主觀唯心論的看法。

綜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出來，胡適所理解的“思想”不是客觀存在在人們頭腦的反映，恰巧相反，只是人們主觀的產物。這樣來看思想和客觀世界的關係顯然是荒謬的。正因為胡適對思想的客觀世界的關係作了如此的曲解，所以他對作為思想的物質外殼語言和客觀世界的關係也作了同樣的曲解。

這裏我們只要從胡適堅決反對使用某些名詞和抽象名詞一點上，便能了解胡適是怎样看待語言和客觀世界的關係的。

1935年胡適在《今日思想界的一大弊病》<sup>③</sup>中曾大放厥詞，他認為“用一個抽象名詞來代替事實”，“用連串名詞的排列來代替思想的層次”“殺事實”“是武斷”。他反對使用哪些名詞呢？比“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自由”……等都在反對使用之列。在文章末尾他要大家“嚴格”戒，五戒總的精神是“與其用抽象名詞，寧可多列具体的事實，事實容易使人明白，名詞容易使人塗”。所以“要記得唐相龐居士臨死時的兩句格言：願空諸所有，不可實諸所無”。

胡適是堅決維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而堅決反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學者”，因此，他不敢面對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壓迫、剝削，以及帝國主義的事實，不敢面對蘇聯欣欣向榮的社會主義建設事實，更不敢讓人民揭露這些事實，使這些事實在民間公開。胡適用“五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搗亂”來掩飾中國社會尖銳的階級矛盾與鬥爭，用“五鬼”來為帝國主義的侵略作辯護是明証。他說：“在這五大仇敵（即五鬼）之中，主義，封建主義，帝國主義都不在內”<sup>④</sup>。胡適在《我們走那路》一文中還清清楚楚地告訴我們，他寧願反革命，也不許世人揭露這些事實，面對這些事實說：“懸空捏造革命對象（按指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殷註）……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

① 《胡適文存》第二集（二）：《五十年來之世界》。

② 《胡適文存》第一集（二）。

③ 見《獨立評論》153號。

④ 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



上，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而不能主張這種革命”<sup>①</sup>。在這裏，反革命的胡適的嘴臉已經是無遺！

胡適的實用主義理論就是建築在這種反革命的階級立場上的。胡適只主張談具體的“問題”、具體的“主義”、具體的“計劃”、具體的“事實”，而反對談“抽象的”、“抽象的名詞”。這就是他的實用主義理論。這理論，在他的文章裏當然是“俯拾即得”，不過《問題與主義》一文可以說是他的實用主義的“結晶”。因我們無妨來看看這篇文章。這篇文章的“主題”是提出的口號：“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論是：‘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點。因為沒有一個抽象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張都包圍在裏面”<sup>②</sup>。由上文看來，他好像是反對一切“主義”當然不是，如果他真反對一切“主義”，那他的“實用主義學者”的稱號也就早已失去了！胡適反對的是社會主義，反對的是社會主義這類“抽象名詞”。他堅決主張實用主義，要不然他肯用七萬字的篇幅來介紹實用主義！由此可知，凡是與他有利的“主義”，有利抽象名詞他無任歡迎，凡是與他不利的“主義”，抽象名詞他堅決反對。這才是道地的實用主義！可胡適反對語言中的一些名詞，或一些抽象的概念（短是有實用主義作理論基礎的。

應該指出，胡適這種思想和歐美資產階級語義學的反動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

卡爾納普、柯日布斯基、柴依茲等都是語義學派首領，他們為了堅決維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利益，便說世界上的一切紛爭，都是由“語言的混亂”引起的，據說只要在用詞上取得協議，社會上一切衝突會消滅。至於人們用的一些詞，在他們看來，都是虛構的，不包含任何客觀內容的。

柯日布斯基宣稱，在人們個人生活中發生的語言學上爭吵，“會引起內部病理學的糾紛，在私人生活中，它們導致家庭的不睦和不滿，從而造成神經錯亂，在社會生活中，它會導致政治糾紛和革命”。

柴依茲在《語言的暴虐》中說：“激進分子仇恨資本主義，但這種猛獸是根本沒有的，他們所仇恨的是虛構的東西，……請你們給運用中的‘資本’照個相試試”。他同時斷言：“正義”“民主”，“法西斯主義”“社會主義”以及其他許多詞都沒有任何客觀內容，他硬說，用“最高倍數的顯微鏡也不能發現它們”。

同時，英、美的億萬富豪和官僚們也在追隨語義學，想在名詞上解決他們克服不了的經濟危機和日

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他們宣稱，“資本主義要新的名稱”，原因是“只要換一個詞就能夠幫助改變歷史的過程”。於是，他們建議從現在起稱資本主義為“經濟民主主義”，“工業民主主義”，“分配主義”，“相互依賴主義”等等。美國洛克菲勒財團的一個經理斯·布龍說，資本主義在美國早已過時，因此他主張用“基督教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英國外交官在聯合國支持美國，說“法西斯主義”這個詞不明確，它的意思是無法弄清楚的<sup>③</sup>。

語義學派和英美統治集團的一些人物的反動觀點跟胡適的反動觀點是多麼一致啊！他們為了鞏固資本主義的統治，所採取的途徑，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同的。由此可見，胡適是道地的帝國主義的傳聲筒和代言人，是帝國主義的忠實走狗。這就是胡適之流對語言與客觀世界的關係的看法。

馬克思主義者對語言中的詞是怎樣看待的呢？列寧在《哲學筆記》中寫道：“任何詞（語言）都是已經概括了的。”又說：“概念的第一個特徵就是普遍性”（原文有重點）<sup>④</sup>。德·高爾斯基說：“詞總是包含一般東西的”<sup>⑤</sup>。M·列昂諾夫說：“詞概括物體的明顯的形象，使我們獲得關於這一物體的概括性的表象。我們用感官來感覺個別的，單個的物體，而我們用詞來表明物體時，我們所表達的就已經是包括該個別物體的那一類東西所固有的共同特點了。所以，詞的特點，和概念的特點一樣，是普遍的”<sup>⑥</sup>。也就是說，詞是從許多具體的事實中找出它們本質上的共同特點加以概括而成的。因此詞具有普遍性和概括性。詞的這種特點：“普遍性和概括性”，對我們人類思維活動，對我們認識客觀世界是極其有意義的。比如，“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詞就含有許多內容。帝國主義一詞概括了一切發展到了最高度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概括了美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也概括了英國、法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點。“社會主義”一詞則概括了：“沒有人剝削人”“生產技術高度發展”“生產能力不斷增

①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我們走那條路》。

② 《胡適文存》第一集（二）：《問題與主義》。

③ 《語義哲學的反動本質》，《學習譯叢》1955年4期。

④ 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解放版，136頁，1949。

⑤ 《論語言在認識中的作用》，《學習譯叢》1954年1期。

⑥ 《從斯大林的語言學著作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問題》，《學習譯叢》1953年2期。

長”“能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sup>①</sup>……等等內容。可以看出，“帝國主義”、“社會主義”這類詞（以及其他的詞）是更深刻更本質地反映了客觀事物，而不是像胡適所說，“是抹殺事實”，也不是像語義學者所說，是沒有任何客觀內容的東西。因此，這些詞（以及其他的詞）是必要的，是人民日常生活，生產鬥爭中必不可少的。

胡繩同志在《唯心主義是科學的敵人》一文中寫道：

我們把胡適所歌頌的“現代國家”用“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概括起來，當然是正確的，必要的。因為這個概念是把事物的本質揭發出來了。

我們現在正在為建設我們的國家而進行着這樣那樣的無數具體工作，具體的鬥爭。把這一切概括起來，就叫做社會主義的建設和改造，也就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概念從本質上表明了我們所進行的工作和鬥爭的內容。

胡適所反對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等等名詞是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後而日益被普遍地使用的。馬克思主義用這些名詞來表現有明確內容的科學概念。這些名詞很快地為廣大人民接受，就因為它們是歷史現象的本質的反映。胡適之流雖然竭力想排斥也排斥不了。

詞的這種概括性，本質地反映客觀的特性，是與語言的抽象能力分不開的。因為“思想是客觀實在的反映，語言是表達方式，是鞏固思想和把思想傳達給別人的工具”<sup>②</sup>。

語言的這種抽象能力，詞的這種概括性是科學抽象的基礎。列寧說：“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不是胡謔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出自然。當思維從具體提昇到科學的抽象時，它不是離開真理，而是更接近真理”（重點是原文上的）<sup>③</sup>。前面舉的“帝國主義”“社會主義”等詞便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出自然”，便是“更接近真理”。因此，如果像胡適之流否定了語言的這種抽象能力，詞的概括性，那末也就是摧毀了科學抽象的基礎，取消了真正的科學。

最後，把胡適的這種謬論歸納一下，大致有如下幾點：

（一）胡適認為語言中所包括的抽象概念（詞語）是客觀的反映，而是人們的捏造，而是主觀的產物。實際上，這是胡適站在反動立場為了替資產階級帝國主義辯護而惡意歪曲事實的表現。從上面的分析看來，語言中所包括的抽象概念（詞語）並非人們的捏造，而是反映客觀的結果。當然，由於階級立場的影響和科學水平的限制，人們的思維反映客觀時，也有不正確的，作為思維的物質外殼的語言有時也不能確標示客觀，比如，胡適和語義學派即是如此。所以，我們要正確地反映客觀。

（二）胡適只主張“事實”，不主張“名詞”；而他主張談的“事實”只是他個人主觀的感覺，所不主張的名詞，却是具有抽象性的更正確的，更深刻的客觀的反映。這樣，胡適就是既宣傳了唯心論，又否認了作為抽象思維擔負者的語言的概括作用，否定了作為思維物質基礎的語言在人們認識中的作用。而斯大林領導我們：“有聲語言在人類歷史上是幫助人們從自然界劃分出來，結合成社會，發展自己的思維，組織社會生產，與自然力量作勝利鬥爭並達到我們今天的進步的力量之一”。

（三）胡適否認語言的抽象能力，詞的概括性，是否認科學的抽象，其結果就是取消真正的科學，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科學的抽象，能把必然的東西和偶然的東西分開，把本質的東西和非本質的東西分開，能揭示出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胡適反對這種抽象，就是為了把本質的東西與非本質的東西混雜起來，把必然的東西和偶然的東西混淆起來，就為了掩蓋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取消真正的科學，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

總之，胡適散佈這些謬論都是為了宣傳他的唯心論，實用主義等反動哲學，為了向馬克思列寧主義進攻，為了掩蓋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為了緩和階級矛盾，從而達到他充當資產階級辯護士的目的。

①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

② 阿歷山大羅夫主編：《辯證唯物主義》。

③ 《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136頁。



## 胡適對祖國語言的蔑視

大家都知道，漢語是我們漢族使用了幾百代的一門語言。我們祖先用它來交流思想，把它當作社會的鬥爭和階級鬥爭的工具和武器。漢語曾經很好地為我們祖先服務過，在社會發展過程中，它又不斷地發展，豐富，成為我們今天最重要的交際工具，同樣很好地為我們全社會服務。自有歷史記載以來，漢語就一直很好地服務於我國豐富而優秀的文化，解放後，漢語也很好地為我國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服務，因此反映了我國過去豐富優秀的文化，同時也反映了今天繁榮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文化。因此，它“現在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sup>①</sup>。

我們來看看胡適是怎樣看待漢語的。

胡適在《三論信心與反省》<sup>②</sup>中說，我們的固有文法有三個優點，其中之一就是：我們的語言的“文法是世界最容易最合理的”，或者說我們的“文法是最簡易的”。這樣看來，胡適似乎是很推崇我們的語言，至少是很推崇我們的語法了，其實並不如此。胡適這句話裏，我們至少可以看出這樣三點意思：

第一，在胡適看來，世界上的語法有“最合理”與“最不合理”之分；實質上是說，世界的語言有優劣之分。第二，認為“我們的‘文法’是全世界最容易”的，只是胡適的主觀唯心論。第三，認為“我們的‘文法’最簡易的”，實際上是符合於資產階級歐美語言學觀中國語言（漢語）的謬論。何以見得呢？我們可在下面的分析中找到答案。

在分析之前應該說明一下，胡適蔑視漢語的反動思想是與他否認語言的社會性，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改造語言的反動思想完全一致的，特別是後者與漢語的思想結合得更緊。因為胡適蔑視漢語，所主張改造漢語，要改造漢語也就是蔑視漢語的一種表現。

下面我們再來分析胡適輕視漢語的思想。

首先要指出，胡適所謂“我們的語言的‘文法’是世界上最合理的”與我們所說“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毫無共同之處。我們把漢語只看作“是

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而不是“世界上唯一‘最發達’的語言”。也就是說，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不少，漢語只是其中的一種。而胡適把漢語語法看作是“世界上最合理的”，也就是說，世界上再沒有比它更合理的了。我們認為“漢語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語言之一”，是意味着什麼呢？不是意味着別的，主要是意味着漢語和世界其他最發達的語言有極其豐富的詞彙來反映高度發達了的文化。也就是說，漢語反映了高度發展的文化，反映了優秀而豐富的文化，因此它是最發達的語言之一。“語法是世界上最合理的”又意味着什麼呢？那是意味着我們長期抽象出來的語法是最合理的，而別人長期抽象出來的語法是不合理的。也就是說，我們語言中的主謂關係，附加語與被附加語的關係等等的表現法是最合理的，而別人的主謂關係，附加語與被附加語的關係等等的表現法是不合理的。這也就是認為語言有最優等的和最劣等的分別。顯然這是最反動，最荒謬的論調，就是符合於帝國主義的口吻。帝國主義不過正相反地說我們的語言是最幼稚的，馬爾曾經犯過這種錯誤。

其次，說我們的語法是世界上最容易的，其實漢語對漢人來說當然是容易，俄語對俄羅斯人來說何嘗也不容易？各種語言的語法是各不相同的，各有各的獨自的特點。從難易來提，還是“語言優劣論”的反動思想的反映，資產階級的語言觀點的反映。

最後應該指出，胡適雖然“推崇”了一下漢語語法，但他是蔑視漢語的。他說我們語法“最簡易”，不僅表現了他的主觀，而且實質上也就是說我們語法最簡單、最貧乏。

解放前許多西歐資產階級語言學者認為漢語是簡單的、貧乏的，而這一種謬論也曾在中國一部分買辦學者中間流行過。因此，胡適有這種看法，也是很自然的。解放前在中國語言學界影響較大的高本漢就說“北京的國語是一種最可憐的方言，老實說，他只有四百二十個各異的音綴”<sup>③</sup>。又說漢語“發音不同的

① 康拉德著，彭楚南譯：《論漢語》。

②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

③ 高本漢：《中國語與中國文》。

音綴很覺得貧乏”而且“這是形成與單音制及無形式變化與轉成字的大原因”<sup>①</sup>，前面所說的胡適改造語言的觀點以及這裏蔑視漢語的觀點都是與高本漢一致的。

當然胡適這種思想並不只是表現在這裏，他在別的地方表現得更為突出。而且他這種蔑視漢語的思想與他崇拜英語的思想是緊密聯繫着的，與他否定中國文化，與他蔑視中華民族的思想是緊密聯繫着的。

胡適一貫蔑視中國語言（漢語），他蔑視古代漢語，也蔑視現代漢語。胡適蔑視古代漢語是很清楚的。胡適把“白話”與“文言”截然割開，把文言說成是早已退化了了的語言，早已死了的語言。他說“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同時說，文言在漢代已死<sup>②</sup>。這些只能說明他對語言、文學的無知，只能說明他對古漢語的蔑視。其實文言在二千年以前的漢代並非“死了的”語言文字<sup>③</sup>。他在談到中國文法學時說：“中國語言文字孤立幾千年，不會有和他種高等語言文字相比較的機會。沒有比較，中國人從來不會發生文法學的觀念”。這顯然是說：漢語是低等語言文字，漢語一直是處於孤立之中。這與馬爾的學說是極其相似的。馬爾說：漢語仍屬原始時期的語言系統，原因是它沒有與印歐語等高等語言接觸，脫離了一般的世界語言發展的進程<sup>④</sup>。胡適雖沒有說出漢語是原始語言，但它總不及“高等語言文字”，因為講漢語的人沒有文法學的觀念，其實中國人早就有了文法學的觀念，只是中國的文法學與西洋的文法學不尽相同罷了。

胡適認為：“吾國文法學……是在今日吾國青年之通曉歐西文法者，能以西方文法施諸吾國古籍，審思明辨，以成——成文文法。”因此，他說：“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這幾千年來，真可算是‘獨立’了。幾千年獨立的困難與流弊還不夠使我們覺悟嗎？我老實規勸那些高談‘獨立’的文法的人，中國文法學今日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獨立’”。意思也就是“以西方文法施諸吾國古籍”才有了過去的成文文法，那末今天也就只有“以西方文法施諸吾國今籍”才可能有今天的成文文法。這豈不是謬論！（他這種思想在今天中國語言學界還有很大的影響）。但是胡適這種謬論不只用於語

言文字，在文化方面他也同樣運用這種謬論。這下面再談。

他對現代漢語也加以誣蔑。他說中國文字太壞了，“實在是一個缺點”，因為有了“四個字頭的名詞和成語”。又說：“中國俗話不發達，所以離着講拼音文字正遠咧”。當然這都是無稽之談。今天流行的“四個字頭的名詞和成語”一部分是經過中國人民百年的選擇傳下來的，一部分是近百年來從外國語中來的。現在這些名詞和成語不僅很好地為我們服務而且還構成我們語言的特點；因此它決不是一個缺點。說我們“俗話不發達”<sup>⑤</sup>，當然不值得一駁。每天都講的是“俗話”，但沒有一個人感到“俗話”不可以表達他的思想。不過從這話裏我們倒發現了一點材料。胡適說我們“離着講拼音文字正遠”是因為“俗話不發達”，可見拼音文字的俗話必然發達。英國、法國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那末他們的俗話一定比我們的俗話發達多了；換言之，英語、法語比漢語要發達得多。其次胡適說我國“俗話不發達”就是直接在高本漢的理論。高本漢曾經竭力攻擊中國“俗話”，說：中國俗話是鄙陋的，“不值得書寫的”。

人們要問：胡適是不是崇拜西洋語呢？他崇拜哪種西洋語呢？這早已有了說明。他是崇拜英語。他說：英語“不但成了英國的標準語，幾乎竟成地球的世界語了”。我們今天並不貶低英語，但它全地球的世界語這是誰也知道的。而胡適這個奴才於崇拜英語，以致明目張胆地幹起了造謠的勾當。

不過崇拜英語，蔑視漢語的思想並非胡適一人，如傅斯年就有類似的思想。他說“白話愈變愈壞，成了退化的語言”。他在文學上、言語學上、修辭以及其他科學上均有缺陷。要“想法彌補，唯有借洋的語法”。他認為“所以能有現在優美的英文

① 高本漢：《中國語言學研究》。

② 《白話文學史》4頁。

③ 胡適打了自己的嘴巴。他在《白話文學史》4頁中說：昭宣間的詔會還是同說話一樣。

④ 見《論漢語》中康拉德對馬爾的批判。

⑤ 胡適所謂俗話，即白話。他在《中國新文學大綱》說“白話即俗話”。



全靠原來用他的文人，能够取理想上的，取外國長，補他的短。這真是我們的師資。我們既然想適我們的國語，在文學上，在科學上，在藝術上的位而少缺憾(陷)，自然免不了從我們的理想，使國語歐化”。他認為白話和文言“犯了一樣的毛病，他其直如矢，其平如底，’組織上非常簡單。……我做起白話時，当然要減去原來的簡單，力求層次的展。模仿西洋語法的運用”(重點是原文有的)①。在眼裏漢語不發達，文法簡單，只有西洋語好，在青年的眼裏亦然。

胡適這樣崇拜西洋語言(特別是英語)，輕視漢語是沒有緣故的，正如前面所說。這是與他否定中國化，蔑視中華民族的思想緊密相關的。也可以說就他的奴才思想在語言問題中的運用。

大家都知道，胡適把我們民族，把我們豐富的文說得是一錢不值的。他說我們民族是“又愚又懶民族”，是“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長進民族”，是“身帶病的民族”②。可以想見，這樣的民族是會有什麼文化的。胡適也說得很明白，他說，如果要以“實際是”的態度來對待我國的文化，那可下個結論：

“有文化實在太不豐富”。或者是“固有文化實在很乏的”③。那人家要問：這樣的民族，這樣的民族文化怎麼辦呢？他也有套辦法，他說“如果希望這個民族有一條生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不如人，不但政治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④。總之一切不如人。為什麼要認錯呢？他也有說明：“肯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不要怕模仿，模仿是創造的必要準備工夫。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當然這樣糟糕的民族是不怕喪失文化的，而唯一的辦法只有死心塌地的學人家。胡適到了後期這種調子唱的更響，他在1948年《大公報》說：“一個民族(中國)沒有自己的獨有的文化，不為恥。貴在要能吸收人家的”。他提出臭名昭著的“西化”或“充分世界化”也不過就是這些貨色。

誰也感觉得到這種調子只有帝國主義豢養的奴才才會唱，也只有這些傢伙才愛聽，真正的中國人會堅決反對的。

也許有人要問：胡適否定中國文化，輕視我們民族是事實，但他為什麼認為中國文法的簡易合理是中國文化的優點呢？他為什麼不乾脆連中國文法也否定呢？這個問題可以這樣回答：第一，從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胡適在肯定它的同時實際上是貶低

了它。第二，胡適有不得不說中國文法好的“苦衷”。我們無妨查一查，胡適這話是在什麼情況下說出來的。我們只要翻一下胡適的《論學近著》第一集(下)就不難知道這一段歷史。胡適論“信心與反省”論了三次，三篇基本內容是相同的，不外說中國民族、中國文化“都百不如人”，但只要肯死心塌地學歐美，那還有點辦法。不過，第三篇與第一、二篇還小有不同，前兩篇完全沒有談中國有何優點，後一篇卻說出中國有三個優點，就是：“最簡易合理的文法，平民化的社會構造，薄弱的宗教心”。為什麼他在後一篇文章裏要說中國有優點呢？這確是因為不得已。原來前兩篇文章發表後，他“收到了不少的討論”，胡適自己說：“都怪我‘把中國文化壓得太低了’……‘抑’的太過火了”⑤。胡適也害怕引起公憤，沒有辦法，他只好說幾個優點了。他說了這三個優點之後，還怕別人不饒他，便只好哭喪着臉說：“此外，我想了二十年，實在想不出什麼別的優良之點了”。由此可見他把中國文法看做是中國文化優點之一只不過是為了息公憤的搪塞之辭。更不要說這種搪塞之辭還是一種謬論。

我們只要仔細想一下，像胡適這種認為“臭蟲也是西洋的好”的傢伙，像胡適這樣滿腦子奴才思想的傢伙，是決不會認為中國有什麼優良之點的，他蔑視祖國語言，崇拜英語，也是毫不足奇的。

總之，胡適蔑視中國語言、崇拜歐美語言的思想是與他否定中國文化、蔑視中國民族的思想一脈相通的，這種思想是要宣傳民族虛無主義，是要扼殺我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是要為美帝國主義從文化上，思想上奴化中國人民掃清道路。胡適這種思想是徹底的民族虛無主義的反動思想，是世界主義的反動思想，是我們今天必須徹底清除的。

### 結束語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胡適對語言的看法是極端反動的，這些看法都是他的個人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實用主義在語言學上的運用。從上文中也可以看出，胡適在語言學中的反動謬論不是無的放矢，而是

① 傅斯年：《怎樣做白話文》，見《中國新文學大系》，《建設理論集》。

②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③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再論信心與反省》。

④ 同③，胡適在《請大家來照照鏡子》一文中也有類似的話。

⑤ 《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三論信心與反省》。

有他鮮明的目的，胡適利用語言學的陣地來為資產階級的罪惡作辯護，說什麼“封建主義”“資產階級”都是捏造的等等，胡適利用語言學的陣地來散佈民族自卑感等，來為帝國主義徹底奴化中國人民掃清道路；胡適在語言學的陣地上散佈他的實用主義，要人們跟着他的實用主義“大師”走。這一切可以看出，胡適是我們祖國人民的死敵，是我們語言學界的死敵，因此，我們應該對它進行嚴厲的徹底的批判。

應該說明，胡適表現在這四方面的反動思想，決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千絲萬縷地聯繫着的，是一致的；同時也是他的反動思想在各種不同問題上的表現。顯而易見胡適否認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主張造國語，反對談名詞，蔑視祖國語言的思想是與他抹殺

語言的社會性的個人主義觀點相一致的；而這些反動觀點，又都來源於他的個人主義，主觀唯心主義和實用主義。曾經有人認為，胡適所說“語言文字的作在於表情達意”並沒有什麼錯誤，看不出有什麼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觀點。現在我們回顧一下，就可以看出這種見解的錯誤。我們不應把胡適的反動思想割開來，作片面的孤立的了解。因此我們要把他的荒謬的語言學觀點當着一個反動的語言學體系來批判。

最後，必須指出：胡適這種反動思想毒素，在語言學界散佈了不少，我們應該徹底清除這些毒素，語言學在健康的路上發展。本文只着重批判胡適，於上面所說清洗流毒的工作，還有待於我們今後奮鬥。

## 談“的”字的分化

李子木

“的”字的分化，是個老問題了。五四時期“的”字就開始分化成“的”“地”“底”，可是直到今天大家分用“的”字的習慣和對“的”字分化的看法，都還不一致。有人說分化好一點，有的認為這種分化沒有必要。在分用“的”字的習慣上，絕大部分人不用“底”字，一部分人只分“的”“地”，很多人仍然是一律用“的”字。

那麼“的”字到底要不要分化？假如需要分化又怎麼分化？我覺得這個老問題需要大家通過討論把它肯定下來。因為這個問題不光現在存在，將來中國實行新的拼音文字時，這個問題還會存在。我現在談談我自己的意見，供大家討論。

我要談的第一點，就是，“底”字必須使用起來。

現代漢語裏的“的”字在名詞附加語和名詞之間擔負着兩種任務，一種任務是表示領有的關係，另一種是作為附加語的語尾表示修飾的關係。例如“藝術的宮”這個短語，我們就無法理解它的本意。到底是“藝術底”的意思，還是“藝術的”意思？

第二點，我認為“地”字可以不必用。

我們分別“的”“底”的目的，是為了把名詞附加語跟它後邊的名詞的兩種關係區別起來。可是分別“的”“地”的作用和目的是什麼呢？按照一般語法書的解釋，“地”字是用在動詞和形容詞的附加語後邊。在形容詞和動詞的附加語後邊把“的”改為“地”，它的作用不過是告訴我們說：這是動詞和形容詞的附加語，而不是其他詞的附加語。那麼反過來想，在形容詞和動詞之外，還有什麼詞有附加語呢？只剩下名詞了。那麼在形容詞和動詞的附加語後邊用個“地”，作用也不過是告訴我們說，這不是名詞的附加語。這用告訴嗎？

漢語名詞的附加語跟動詞的附加語，不用告訴我們，我們就很清楚的。這是因為漢語的動詞跟名詞之間的界綫比較清楚。因此，漢語一般的名詞附加語和動詞的附加語，我們一看它後邊的動詞和名詞，就清楚它的性質。而且如果“的”“底”分用以後，在動詞的附加語後頭仍用“的”字，即便說它跟名詞附加語容易混淆，它也沒法再跟名詞的領有性的附加語相混了。這樣，動詞的附加語跟名詞的附加語之間的界綫，就更清楚了一步。因此，我認為在動詞附加語後邊用“地”字更是多餘的。

形容詞的附加語跟名詞的附加語，雖說漢語的名詞和形容詞詞性間的轉換比較多，但是漢語形容詞的附加語，一來出現的次數比較少，二來能作為形容詞附加語的詞在漢語的詞彙中很有限。同時，自“底”字被使用起來以後，名詞附加語跟形容詞附加語界綫也更明確了一步。所以在漢語的形容詞的附加語後邊用“地”也是多餘的。

中國遲早要實行新的拼音文字的。這個道理不容懷疑。“的”“底”雖然在形式上有了區別，可是在讀音上還是一樣。那麼到我們實行拼音文字的時候，這兩個字是不是拼成一個聲音？“的”“底”假如只讀作一個聲音，那只是解決了我們的視覺問題，問題只解決了一半；更重要的一半，聽覺的一半，還沒有解決。

我認為，中國將來的拼音文字，無論如何不能把“的”“底”拼成一個聲音。我們根據中國北方的漢語讀音，決不可以把“的”拼成 de 或 dar，把“底”拼為 di。

不能否認，這樣的辦法帶着人為的性質。不過這樣的人為的性質很微小，可以為大眾所接受。我們的拼音文字這樣作了以後，經過一個相當時期，它就會對語言起一種反作用，使“的”字在口語上也慢慢走向分化。



# 布拉格學派

## ——批判特魯別茨科依的音位學說——

謝爾久琴柯教授

在西歐和美國資產階級語言學裏現在廣泛地傳播所謂結構的語言學學派，或簡單些說，就是結構派（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這個學派的中心，目前在歐洲是丹首都哥本哈根和瑞士的日內瓦，在美國就是紐約。這個學派主要是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和奧地利維也納發展起來的。結構派的代表人物是特魯別茨科依（Трубецкой）和雅柯布遜（Якобсон）。他們在這個城市工作了很長時間。

1926年秋天，在布拉格成立了所謂“布拉格學派”。這個學派很快就開展了它的活動。它不僅影響歐洲一些國家（波蘭、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和法國）的許多科學家，同時也影響了本和美國的許多科學家。在個別的蘇聯科學家的作品中也曾表現出這種影響。正是因此，在蘇聯科學家中，對結構派這個語言學界的唯心主義的反馬克思主義的學派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結構派分子當中，在也可以找到那些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和反對人民主制度的頑固的敵人，如雅柯布遜以及在方法學上他站在一起的勃良達爾（Брёндаль）和其他一些人。

“布拉格學派”研究過語言學上的各種各樣的問題，特別是普通語言學上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基本上是遵循着法國-瑞士學者索緒耳的理論。他們談語音學和語法的問題、修辭的問題以及文學語言和語言的問題。他們很少注意詞彙學，特別注重音學（фонология）。因此，布拉格學派也常稱為“布拉格音位學派”。特魯別茨科依在布拉格寫成並發表了《音位學原理》（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和其他有關音位學的作品。

當然，我不準備講述布拉格音位學派活動的所有各个方面。因為這會佔去非常多的時間。有人問我布拉格這一派音位學者們的基本觀點抱什麼態度，在我就來談談和批判一下這些觀點。

我在以前講課裏已經講述過俄國科學家們在創制音位理論上所起的作用。在這方面，最偉大的功績是屬於博杜恩·德·庫爾特內（Бодуэн де Куртене）和謝

爾巴（Щерба）這樣一些俄國科學家。

我們蘇聯語言學家在對語音學和音位學理論的看法上，目前仍是堅持着謝爾巴院士的原理的。謝爾巴在他晚年的著作（像《法語語音學》等等）裏，對語音學和音位理論的基本問題作了唯物主義的闡明。特魯別茨科依和雅柯布遜一度曾是謝爾巴和謝爾巴的老師博杜恩·德·庫爾特內的学生。

博杜恩·德·庫爾特內在發展他對語音學和語言問題的看法上曾經歷了一段複雜的路程。他不止一次地考訂和修改過自己的看法。他在他的個別的著作<sup>①</sup>裏，描述了功能原則是語言學的基本原則，也就是：所有的語言材料要從它們所執行的功能，換句話說，從它們所執行的任務的觀點上來探討和研究。音位的概念與這一功能的原則相聯系並在這個原則的基礎上確立下來。音位在語言裏執行着區別詞義和區別詞形的功能。

Л. В. 謝爾巴院士剝掉了音位學說上的心理學派和唯心主義的外殼，最後建立了正確的唯物主義的音位學說。他在他的《法語語音學》一書中寫道：“在活的口語裏發出來的聲音比通常我們所想像的聲音的數目要多得多。這些不同的聲音在各該語言裏結合成數量較少能夠分辨詞和詞形的語音類型（звуковой тип），來為人類交際的目的服務。人們在談論個別語音時，

\* 這是謝爾久琴柯教授對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系幹部講稿中回答問題的一節。

① 博杜恩·德·庫爾特內的碩士論文《論十四世紀以前的古波蘭語》是他用新觀點處理語音問題的第一部著作。“фонема（音位）”這個名稱是博杜恩·德·庫爾特內的学生克魯舍夫斯基（Н. В. Крушевский）創造出來的。克魯舍夫斯基第一次應用這個術語是在《印歐語元音方面的最新發現》這篇論文中（見《俄羅斯語言學報》36頁，1880年出版）。博杜恩·德·庫爾特內專門談音位的著作是他發表在勃羅高茲（Брокгауз）和葉伏龍（Ефрон）的《百科辭典》中《音位》一文（見該辭典1902年版，36卷，240頁）。關於音位這個問題，他在他那本印刷過好幾版（最後一版是1917年出的）並且最能反映他後來的觀點的《語言學導論》裏也談了很多。

正是提的這樣的語音類型。我們就把它們叫做音位”<sup>②</sup>(重點是我加的——謝爾久琴柯)。

應該注意的是謝爾巴院士談到音位也就是談到固定的語音，也就是談到了實際存在着的物理上的現象在一種語言裏結合成為數量較少的語音類型，也就是結合成為一定的語音系統，能夠分辨詞和詞形的音位系統。

法語的  $\epsilon$  和  $e$  是兩個不同的音位：et(和)est(是，存在)。俄語中同樣的聲音：этот(這個)，эти(這些)(開的  $e$  和閉的  $e$ ) 不過是一個音位的不同變體(вариант)。這樣看來，每一種語言中歷史地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區別詞義和詞形的音位；在這種語言裏它們是這些，而在另一種語言裏則是另外一些。在這種語言裏可以算作獨立音位的語音，到另外一種語言裏，也許就僅僅是一個音位的一種變體。

任何語言的任何音位雖然是用來區別意義的，但它同時具有一定的音質(звуковое качество)，它是一定的物理上的語音，而這種物理上的語音起着一定的區別意義的，即社會的功能。

謝爾巴院士認為把功能和產生這種功能的东西割裂開來，把每一語言的音位和它的物理-生理的特性，也就是和音響-發音的特性割裂開來，這是不可容忍的。因此他堅決反對把語音學和音位理論分裂開來，反對把音位學劃分為能夠脫離語音學而獨立存在的一個語言學部門。

按照謝爾巴說，音位永遠是有語音-物理基礎的。但是音位並不是一成不變的东西。現在存在着一些不同的音位變體，這些不同變體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在發這個音的時候可以有一些物理-生理的變體。但是，音位永遠還是統一的，這種統一決定於意義。

謝爾巴寫道：“事實上，發問的小品詞“а?”用大聲或小声唸，用低音或高音唸，當然會發出在物理學上和生物學上有區別的聲音。但是，從語言學的或社會的眼光來看，這是同一個小品詞，同一個語音。因此，在這種場合裏，在個別現象裏，不管這些物理學上、生物學上發音不同的“а?”是什麼樣兒，我們看到的是一種一般的东西，我們用來作為交際使用的正是這種一般的东西。

這種一般的东西決定於什麼呢？很明顯的，就是決定於作為語言的基本任務的交際(作用)，也就是說，歸根結底就是決定於意義：統一的意義使我們甚至於能在多多少少不同的語音裏認出同一的东西<sup>③</sup>。

語言的交際功能，做人們的交際工具——這就是人類社會中語言的基本功用。列寧說過：“語言是人

類交際極重要的工具”<sup>④</sup>。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也給語言下了同樣的定義。斯大林寫道：“有聲語言或字底語言始終是人類社會唯一的能作為人們完滿交際工具的语言”<sup>⑤</sup>。

這就是蘇聯語言學家對音位問題的看法。特魯別茨科依和雅柯布遜是兩個白俄。他們抓住了博杜安·庫爾特內和謝爾巴早期的一些體系，索緒耳的觀點把這些體系加以改造，因而將音位學說引向了死胡同。

特魯別茨科依和其他的結構派學者的學說都是根據着索緒耳下面這些論點的：(1)必須把作為超乎人系統的語言(langue)和作為這一系統具體應用的語(parole)區別開；(2)語言是建立在對立(противопоставление)上的。索緒耳說：整個語言的機構(механизм)……是奠定在……對立上的，奠定在由對立而產生的語音和觀念的差別(концептуальное различие)上的。按照索緒耳講，“語言學系統中只存在關係(отношение)”<sup>⑥</sup>。索緒耳的門徒們，以各種各樣的腔調重述索緒耳的說法，把語言了解為結構公(структурная схема)，完全忘記了語言最重要的——人們交際的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人類社會爭和發展的武器。

結構學派“權威”葉爾姆斯列夫(Л. Ельмслев)在《語言學的結構分析法》一文中明目張膽地說：“把語言了解為關係之間的純結構，了解為公式，了解為跟它的那種偶然(語音的、語義的等等)實現相聯繫的东西”。按照葉爾姆斯列夫來看，“以聲音或符號意義為代表的對比關係中的成分是現實的語音位”<sup>⑦</sup>。

特魯別茨科依根據着索緒耳的觀點在其《音位原理》一書中一開頭就說，必須把語言和言語區別開，隨後就把在這之前統一的語言學分為兩門“科學”，就是語音學、或者叫言語語音學，和音位學、或者叫言語音位學。照特魯別茨科依來看，語音學只應該

② 謝爾巴：《法語語音學》，1939年，2版，16-17頁。

③ 《法語語音學》18頁。

④ 《列寧全集》，20卷，368頁，《論民族自決權》。

⑤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46頁，人民出版社版。

⑥ F. de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索緒耳：《普通語言學教程》)1922年巴黎出版。引文見1933年莫斯科俄文翻譯版(Ф. де Соссюр, «Общей лингвистики»)([譯名同上])，120頁。

⑦ 葉爾姆斯列夫：《語言學中的結構分析法》，本哈根出的《語言學報》(Acta Linguistica)，1950-51年6卷2，3兩期，61頁。



音的音响和發音方面，而音位學只應研究功能方面。特魯別茨科依並且還說：語言學的特點在於：“它徹底排斥了被研究的語音組合(комплекс)跟語義之的任何聯繫”<sup>⑧</sup>，而“音位學應該研究，在一個語言怎樣的聲音差別是跟區別意義有關的，這些區分因(或特徵)是怎樣相互對待並且是按什麼規則配合在(或句)裏的”<sup>⑨</sup>。

按照索緒耳講，“語言之中除去差別，沒有別”<sup>⑩</sup>。特魯別茨科依完全信仰了這一套，並且把音位的任務也看作是確立由於語音對立而出現的那些語音差別。特魯別茨科依說：語音學家“應該注意排斥切照顧到意義的可能性(即符號的功能)”，而音位學家“只應該注意語音中那種有一定功能的东西”(即別意義的)<sup>⑪</sup>。

特魯別茨科依確定語音差別是由於對立而產生，因而，他在規定音位實質時，也是從音位對立出。他寫道：“語言中一切能區別意義的語音對立，是我們所說的音位對立”<sup>⑫</sup>。下面他又下了一个音位的定義：“每一個這樣對立的成分，我們稱為(區分的)單位”<sup>⑬</sup>。最後他就給音位下了以下的定義：“語言中不能再分解為更短的，一個接續一個的語音單位，叫做音位。這樣一來，音位就是語音中最小的語音單位”<sup>⑭</sup>。

這樣看來，按照特魯別茨科依的說法，音位只是位中的一個成分，至於音位現實的音質是什麼以及音的音响-發音的特徵是什麼，這些就毫未引起結構派學者們的注意。他們在研究功能時，是把功能和產生這種功能的东西割裂開來的；他們在研究人類語音的區別意義的功用時，是把這種功用當作非物質、跟人類實際語音的本身脫離的东西來處理的，是這種功用當作是可以不管語言的基本功能——作人類的交際工具——而能獨立研究的东西來處理。語言似乎變成了一個空的死公式，變成了跟它的本功能毫無關係的一些對立物的體系。

結構學派關於所謂的“原型音位”(архифонема, 或отофонема)的理論也是徹頭徹尾的唯心的。這種“原型音位”，個別作者還稱之為“混合音位”。

因為音位，按照結構派的看法，只是對立中的一個成分，所以它只能在把它和另一個成分對比時才顯出來，只能在它們存在於相同的語音環境的條件下露出來。但是語言裏有這樣的情況，就是在語音不對時也是不同音位。例如，俄語詞尾的清輔音和濁輔音(лук 草原, лук 弓、葱，都唸成 лук; мод 樣式, мода 多數第二格, мот 敗家子)；輕讀的 о 和 а(нагой 裸的, ногой 腳, нога 的單數第五格)。按照謝爾巴院

的觀點(чередование) г/к; д/т; о/а 等等。按照結構派看，因為對立在這些情況下消失了，中立了，因此應該把發出來的這個音看作是“原型音位”。特魯別茨科依認為：應該把原型音位看作是兩個音位的共同的區分特徵的總合，例如 г+к, д+т, о+а 等等。但是結果得出“原型音位”沒有實際的語音特點，因為 мод 和 мот 中的 т 或 лут 和 лнк 中的 к，這些“處於末尾的原型音位(特魯別茨科依語)可以得到的定義只是舌尖破裂音 д/т，或者是舌後破裂音 г/к，不表示清濁。但是要知道，這樣的音位在人世間是沒有的——俄語中每一個輔音不是濁的便是清的。如果這個音不是濁的，也不是清的，那麼它是什麼樣的呢？如果是僅只依據對立，僅只是確立差別和對立的關係，那麼就完全不能在沒有這對立的地方確立音位。例如俄語 где(在那裏), здоровье(健康)兩詞的第一個音 г 和 з。這裏又是唯心主義的死胡同，布拉格音位學家及其門徒們造成的死胡同！他們輕視語音的物理本性，把語音的功能和它的音响-發音特性分裂開來，承襲索緒耳的那些在方法學上極端惡劣的觀點，因而走入窮途末路。玩弄對立，企圖把語言看作是毫無實體的公式，輕視人類言語的物質、語音的本性，形而上學地把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的觀念對立起來，以及形而上學地把語音學和所謂的音位學割裂開來——這就使布拉格音位學派、結構派音位學者陷入唯心主義的迷宮。

布拉格學派以及其他結構派分子的主要毛病就是：他們企圖把語言和它的“自然物質”，和它的物質的實質分裂開來。特魯別茨科依是布拉格學派以及其他結構派分子中的“權威”。他在他那本《音位學原理》書中敘述了結構派音位學的所有的基本論點。因此，我就專講了特魯別茨科依的學說。他從俄羅斯老師那兒抄襲了音位有區別意義的功能這一論點，後來由於依據着索緒耳的唯心主義觀念，把這一論點加以改造，從而就歪曲了它。

對這一問題有興趣的，想對布拉格學派有更多了解的，可以看一看列施卡(Лешка)的《論結構派》(《語言學問題》1953年第5期)以及1952年和1953年結合音位問題的討論在《蘇聯科學院通報，文學和語言部分》上發表的那些文章。

(劉湧泉、陳鵬譯)

⑧ 特魯別茨科依：《音位學原理》，13頁。

⑨ 同上書，14頁。

⑩ 《普通語言學教程》，(俄文翻譯版)，199頁。

⑪ 《音位學原理》一書，14頁。

⑫ 同上書，32頁。

⑬ 同上書，32—33頁。

⑭ 《音位學原理》，34頁。

# 電碼改革問題的研討

王蔭樞 馬玉崑

《中國語文》第37期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郵電部朱學範部長《文字改革和郵電業務》一文，其中對於電報電碼的改革指出了明確的方向——“四碼電報的缺點已經很多，應該改革，向拼音化邁進；這是完全必要而且可能的”。這一改革是符合客觀發展需要和職工羣眾的要求的。

電報通信是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黨和政府機關、企業迅速準確地進行工作，保證國家工業化的順利發展，國防力量的不斷增強，及滿足勞動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日益增長的需要；在維繫世界各國愛好和平人民的連系，溝通日益頻繁的經濟、文化的交流等方面，電報通信也如同神經樞紐貫串着各項工作。

由於我國經濟建設的不斷高漲，國際事務日趨頻繁，電報業務已打破歷史上的最高紀錄。幾年以來電信事業相應發展，電報和長途電話可以相輔並用，所以方塊漢字不能直接傳遞在電報上，增加了翻譯處理的手續，影响着電報的迅速準確的問題在國內電報通信中還不太突出嚴重；在國際之間由於長途電話還不能及時開放，而且電話又不能成為一種正式文件，所以電報成了對外連系最重要的通信工具。

對於四碼電報的改革雖然作了長時期的研究，但對改革的方向和步調及一些有關問題在認識上還不能協調一致。有的認為漢字在現在和一定時期的將來還不能廢除，即應根據漢字的特點來考慮這一改革，傳真電報可以將漢字的字跡形狀及圖片等都能毫不失真地傳遞過去，所以只有傳真電報的方向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傳真電報的優越性是人所公認的，但是由於它的機械設備的複雜和成本的昂貴，在社會主義的蘇聯還沒有廣泛利用，國際之間傳真電報的利用也很不普遍。所以希望傳真電報來彌補漢字使用在電報上的缺陷還是不能解決現實的、全面的問題，四碼電報的改革還是有必要的。

文字改革的方向是走世界各國拼音化的道路，而拉丁字母又是拼音文字最通用的字母，也符合我國電報通信設備和技術操作上的要求。東北鐵路幾年以來使用拉丁化新文字電碼已取得成績和經驗，雖然大家對在打電報時改用拉丁化新文字的方向沒有分歧，但

對一些具體問題還有不一致的見解，今提出我們的見提供研究改進的參考。

一、拼音電碼能促進電報速度的提高。因為電的主要計量單位是電報份數、電報字數和電碼碼數（電報中的一切字母、數字和標點符號等），電碼在改革前後對於電報的份數是沒有影響的，但對電報的數和電碼的碼數都可以顯著減少，因為使用拉丁字可以作到詞的連寫，反映在電報上則是字數的減少，拼成每個漢字的拉丁字母亦將會少於現在代表每個字的四個數碼的碼數。同時可以簡化翻譯的手續，縮短電報的傳遞時間和處理時間。不僅如此，新文電報可以廣泛地採用印字電報機直接傳遞字母（蘇聯鐵路系統就是用蘇聯的巴吞機來適應拉丁化新文字報通信的），而印字電報機應該肯定地說是電報通信發展的方向——機械化的方向。提高電報速度的同時會大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列寧曾指出：“歸根到底勞動生產率這對新社會制度底勝利來說是極為重要的”<sup>①</sup>；斯大林同志在聯共黨第十六次代表大會上說過：“若不使工業方面和農業方面的勞動生產率都一貫不斷的增長，我們便不能解決改造事業方面的種種任務，便不僅不能趕上和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並且甚至不能保持住自己的獨立生存地位。因此，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問題對於我們有頭等重要意義”<sup>②</sup>。

二、拼音電碼可以提高電報質量防止差錯的產生。機械設備維護的不週和違反操作規程等情事都會成電報差錯的原因，四碼電報由於倒碼和錯碼所產生差錯是不易防止的，因為任何四個數碼都代表着一個漢字，而拼音電碼可以大大地消除這種差錯產生的可能；有人認為四碼電報一律是以四個數碼來代表一個漢字，而拼音電碼每個字裏所包括的字母多寡不一，不易掌握，容易產生差錯；這不過是一種懷疑和慮，實際上這種論點是不能成立的。

蘇聯的經驗告訴我們：“很多的差錯是由於不善按音節來念字和不把它們念完全的毛病而發生的。”

① 列寧：《列寧文集》，3版，24卷，342頁。

② 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10版，402頁。

③ Б.Б.勃龍奈爾：《蘇聯報務員讀本》，人民郵電出版社出版，郵電部編譯室翻譯，49頁。



問四碼電報如何能按音節來讀呢？事實上我們很多報值機人員對每個漢字是用什麼數碼來代替是不能掌握的。《中國語文》1953年9月號23頁對這些題亦曾論及。

三、提高電路利用率降低電報成本。“裝在報路的設備利用程度由設備利用率表示。設備利用率是：某一定時間內，實際拍發的電報數目與同一時間內路的工作能力之比。由於負荷量不均勻，所以較長一段時間（如一晝夜）來計算的設備利用率不能作為標準，並在實際上往往是不高的，約25—35%。所以更重要的是以負荷量最大的時間來計算這個利用率。這時設備利用率應該最大，約100%，而在超額完生產定額時，利用率在100%以上。在生產中採用的技術和處理電報的先進方法可使設備利用率提高。”<sup>①</sup>我們衡量電報通信設備利用率的高低常是以24小時來計算的，自然顯得很低，如果以負荷量最大的時間來計算也將會達到和超過100%，有的局電報業務很多，而逾限電報（電報傳遞處理所需的時間超過規定的時間，不能完成時限指標）的比重很大，這有待通過電碼改革和各方面的改進而加以糾正的。

四、電碼改革必然會牽連到電報資費及有關章則制度的改革。每一項生產改革都將會關係到企業管理一系列的改革，所以每當一件新的設備或先進經驗用到生產上時所有生產設備、勞動組織、操作程序、材料供應等方面都要相應地進行改革，與此同時也將促使有關各方面的改進和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電訊的改革自然也不例外，將會直接影響到電報資費及有關章則制度的變更，其間並沒有大的困難和矛盾。只要能肯定收穫，作到了與廣泛的電報使用者的便利和利益的結合，必然會取得各方面的協助和支持。

五、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拼音化的電碼在各方言區或是方言比較特殊的地區如何執行呢？這也是在電碼改革之前一般人所顧慮的。電報能夠直接通達的地點多是可以暢通長途電話的地方，目前全國大中城市和中小城市之間長途電話業務頻繁，電話工作者因為方言而影響工作，在直接交談中也沒有因方言

而感到隔閡。電話工作者為了工作需要能流利清晰地運用通俗的語言這已是廣泛的事實；電報工作者為了保證迅速正確地完成通訊任務，只要注意糾正方言裏不合規範的地方，學習規範化的語言，必然會諳練地掌握拼音電碼，有些人學習拉丁化新文字的同時也學會了說規範化的話。方言的問題是存在的，但在電報工作者當中是可以克服的。

六、四碼電報沿用已久，驟然改變是否會給電報工作者帶來困難？四碼電報已有七八十年的歷史，在電報工作者當中工齡長的人員已把近萬組數碼背誦如流運用自如，這種既有的業務知識亦將隨着電碼革新而不能再運用在工作上，擺在每人面前的將是迫切而重要的學習任務，都要從頭學起，這是必然的。經濟建設不斷發展的过程也就是對各項工作不斷改進和學習的过程，每項革新都是從全民的利益出發，圍繞着建設社會主義的需要，是不能從個人的得失和便利着想的。近萬組不同的數碼優秀的電報工作者都能在勤學苦練中把它靈活地掌握起來，改成科學的拼音化的電碼在記憶和使用上都將會有很大便利，電報工作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業務知識，經過一個很短時期的學習必然會使拼音文字的電碼正確而熟練地運用在電報通信上。東北鐵路的電報工作者經過十二天的學習，即掌握了拉丁化新文字電碼，只要我們經過短時期的勤學苦練，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在蘇聯所有電報值機人員除過掌握俄文字母的電報外，都能處理拉丁化拼音文字電報，學習和諳練地使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已成為每個電報工作者最起碼和必備的條件。

與電碼改革所關連的問題還是很多的，這就要求依靠羣眾尤其是電報工作者的智慧，為電碼改革作好一切準備工作，使電報通信在現有的基礎上有所改進和提高，並為文字改革創造條件，為行將到來的文化建設高潮奠定下勝利的基礎。

① 蘇聯C.C.谷謝夫等著：《電報通信管理》，人民郵電社出版，郵電部編譯室翻譯，89頁。

# 文字改革工作中的鉛字改革問題

陳 越

## I. 我國鉛字設備的一般情況

我國字模的來源十分複雜：有從日本輸入的；有由本國鑄字所獨自設計刻製成的；有剽竊別人的出品略加修改翻製成的；有東拉西扯許多牌號的出品原封不動翻製成的；等等。由於來源不同，規格當然混亂不堪。

高低不一 鉛字的高度，英美制是 0.918 英寸，日本制是 0.919 英寸，我國則很不一致，甚至 0.923 英寸的也有。這些不同的高度，似乎相差很微，可是不同高度的鉛字混雜起來，拼成印版，印刷出來的成品，有些字會看不見或模糊不清，有些字卻墨色太濃，而且鉛字容易磨損。

為着彌補這一缺陷，我國印刷工人就要化費許多時間精力在貼版的工序上，細心地在滾筒或壓板上貼上許多大小不一的小紙片和挖去許多大小不同的小洞。通常印刷 3,000 份的印件，一般平台印刷機的轉動時間不過約 1 小時，裝版貼版的時間要化 3 小時左右，多不經濟。

深淺不一 不同大小的鉛字，筆畫刻槽的深淺，國際間是有通用標準的。我國鉛字的刻槽，越來越淺（省刻工），不能充分發揮鉛字的潛能。由於深淺不一，往往在同一頁的出版物上，有些字還很明朗，有些字卻被印刷得模糊了，影響出版物的印製質量。

大小不一 計算鉛字面積的國際通用長度單位叫“點”(point, 或音譯作“磅”“標”)。“點”的一般概念是  $\frac{1}{72}$  英寸，但各國習慣上所用的點，仍然存在着各種不同的具體內容，並不統一：

[1] 1 點等於  $\frac{1}{72}$  英寸，每點應為 0.013888 英寸，合 0.35277 公厘；

[2] 蘇聯制，1 點是 0.376 公厘，合 0.014803 英寸，72 點應為 1.065816 英寸；

[3] 美國制，1 點是 0.013837 英寸，合 0.35146 公厘，72 點應為 0.996264 英寸……

日本印刷業沿用着美國制，而我國字模又多是从日本輸入和根據日本字模仿製的，所以多數用的是美國制；其他那就雜亂無章。點的內容不統一，採用同

一點數設計的鉛字，不同的鑄字所的作品彼此就有着大小的差別。

就鉛字的大小種類說，我國鉛字同時存在着“派克制”“點數制”兩個不同的系統。初期僅有派克制六號(8 點)、五號(10 點)、四號(14 點)、三號(16 點)、二號(20 點)、一號(28 點)……；後來又增加了點數的七號(6 點)、小五號(9 點)、小四號(12 點)、小三號(18 點)、新一號(30 點)……。兩種制度的鉛字夾在一起，大小合不攏；字面較大的標題字，18 點同 28 點同 30 點等之間，相差很小。兩種制度的字並存，實在是浪費。

同一號的鉛字，許多鑄字所又並不按照上述的一般規格來設計，六號有 8 點和 7.75 點、7.5 點的，五號有 10 點和 10.5 點、11 點的，四號有 14 點和 15 點的，二號有 20 點和 21 點的，等等。不僅這個廠同那個印刷廠同一號鉛字的大小不同，同是一個印刷廠也往往不同。兩種鉛字的面積相差一點半點，似乎關係不大，把它們孤立起來觀察，連內行人也辨認，但排成二三十行一行，兩者就相差一兩個

派克制和點數制的同時存在，同一號的字點不一致，點的計算單位不統一，這 3 個因素就構成我國鉛字大小不一的混亂局面。

字體不一 我國鉛字字體不一的現象，分析起這 3 個方面：

[1] 字體結構方面：宋體的“乚”是兩點的，楷體的“乚”是 1 點的；“眞”是宋體，“真”是楷体；……體同手寫體不統一，這是顯而易見的，至於同是宋體，字形結構上較微細的差異，那更不勝列舉。去 1 副鉛字設計質量好壞的命運操在書法家、資少數人之手，大體上規模較大、較肯化錢的鑄字廠而老板和設計人文化素養較高、態度又較認真的品質較高，否則就較低或很差。互相抄襲，因循，則是一般現象。

[2] 書法體裁方面：同樣是宋體、黑體，不同字所的作品，在筆畫的粗細上往往有很大的區別。別是仿宋體、楷体，不同的牌號，彼此自成一格。副字通常是由 1 位書法家寫成的，個人的因素



[3] 字面大小方面：同一号同一字体的鉛字，字小又有“足体”“縮体”的區別。所謂“足体”，是字量占滿鉛字的面積，排成1行的時候，字与字間接；所謂“縮体”，是字面較小，四边多留空位，排成1行的時候，字与字間的距離較大。采用“足体”“縮体”，我國鑄字業從來漫無標準，越是面積大的彼此差別越大。

鉛字的大小字体不統一，使得印刷業產生許多麻煩。各号鉛字拼排在一起，不能緊密配合，不用鉛片或厚紙片填補空隙；体积較小的鉛字，翻活版時容易散乱，在印刷机上直接印刷時容易跳字事故；这个廠同那个廠之間在鉛字設備上不通用有無；印製質量要求較高的1套多卷集作品或書，要自始至終在同一印刷廠排印。重版的書籍，別字句因为修改而需要挖補紙型，或者有若干面重新排版，往往非由原來承印的印刷廠辦理不可。中央一級出版社的出版物，不少由於印數多、時強，要分寄紙型到各地分區造貨供应，有時在紙出後發覺个别字句需要修改，不得不把要用的鉛寄到各地去，費時失事。如果不是鉛字規格不統本來分別去信或用电報通知就可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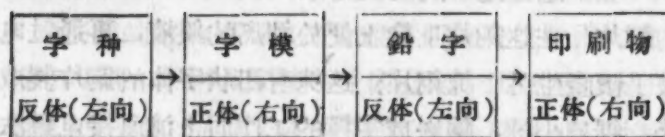
我國鉛字規格混亂情况的根源在那裏？这完全是主义生產的必然結果，是舊中國帶給我們的沉重。国民党反動政府從來不过問鉛字規格問題，鑄一直掌握在資本家手裏，字模生產從來處於自由盲目發展的状态；近五六年來，情况幾乎沒有。鑄字所老板高興采用某种規格就采用某种規格高興新創某种字体就刻製某种字体，高興增加某就增加某个字，結果是：在種類上花樣百出，標異，以廣招徠；在規格上，故意做成特殊化，使客以後無法跑到別家去；在字數上越來越多，本副鉛字五六千个可以够用了，却搞到七八千个。資本家終極的目的是得到最大限度的利潤，滿足其是圖的要求。

## II. 字模的製造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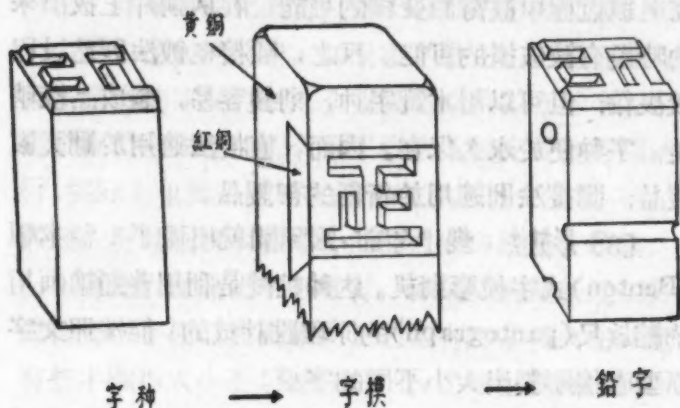
字模又叫“銅模”，日本叫“母型”，它是鑄造鉛字的工具——模型。要製造字模，首先要有原始“字种”，它是鉛字的始祖，所以又叫“字底子”“原日本叫“父型”。

字种上的字体是凸狀反体的；字模上的字体是凹体的；放在鑄字机裏鑄出來的鉛字上的字体又反体的；从鉛字上印出來的字体才是正体的，

它的順序是：



字模的形狀有“片模”“隻模”的區別，“片模”是許多字集中在1塊銅版上；“隻模”是1个字1根銅質的四方短桿。我國印刷業用的都是隻模，片模的製造還缺乏經驗。下面介紹的是隻模的製造情况：



[1] 冲压法 又名“压型法”，字种是銅質的。首先在銅質材料上用手工或机械彫刻出凸狀反体的字形，然後放在爐裏燒紅它，再經淬火手續增強它的硬度，把軟鋼变成硬鋼。

鋼質字种刻成後，字体向下垂直地对準銅片，用手敲打或者利用机械的冲力驟然压在銅片上，經過修整研磨就成为凹狀正体的字模。

外國拼音文字所用的字模，絕大部分是用冲压法製成的。每1个字种可以压製出200—300个字模。

[2] 电镀法 這類方法又分为兩種：

直接电镀法——采用这种方法的字种必需是金屬的。通常在没有字面的平滑的空鉛上，用手工刻成凸狀反体的字；也可以利用現成的鉛字，經過細心修飾作为字种。

把若干个字种用鉛片夾成1行或若干行，網紮起來，除字面部分外，三面塗上蠟質，挂在电镀缸（电解槽）裏，經過約150小時，讓字面上聚集着1層厚厚的紅銅。

电镀工序結束後，把字种逐個拔出來；留下的紅銅片按各个字鋸開來，成为一片片的小方塊，这叫“模芯”；再把模芯鑲嵌在黃銅的四方小桿上，經過精細的校正、研磨，最後成功为字模。

間接电镀法——蠟型电镀法。采用这种方法的字种可以是金屬的，也可以是木質的。字种準備好後，压在蠟質和黑鉛的混合溶液上，冷却後即成为凹狀字体的蠟型。

蠟型通過通常的電鍍方法，鍍成一塊有凸狀字體的銅片；在這銅片上塗上便於剝離的銀液，再通過電鍍手續產生另一塊銅片；這塊有凹狀字體的銅片製成後，鋸成小塊，鑲嵌成字模的工作同上述直接電鍍法一樣。

兩種電鍍法各有它的優缺點，也各有它的用途：直接法製造過程較簡便；但用的必須是金屬字種，刻製較困難，用現成的鉛字複製則效果不很好，字種有在電鍍過程中被腐蝕變樣的可能，在從銅片上拔出來的時候有被破損的可能。反之，間接電鍍法製造過程較複雜；但可以用木質字種，刻製容易，製成品較精美，字種便於永久保存。因而，直接法適用於翻製複製品；間接法則適用於新創的初製品。

〔3〕彫刻法 幾十年前，國際間就出現了1種本頓(Benton)式字模彫刻機。這種機械是利用普通繪圖用的縮放尺(pantograph)的原理設計成的，能按照文字原型直接彫製出大小不同的字模。

所謂文字原型，是1塊特製的銅片，正規的大小是4平方英寸。首先是把要刻製的那個字寫出來，用複寫紙轉印在蠟型上，勾畫出凹狀的輪廓；再通過電鍍手續，製成1塊上面有凸型文字輪廓線(通心字)的銅質“文字原型”。

文字原型安放在彫刻機上，一方面探針沿着原形上文字周圍凸起的輪廓線的內部移動；另一方面這種運動傳到彫刻針上進行彫刻。同是1塊文字原型，可以通過機械刻出各種大小字模。

本頓式字模彫刻機是1種非常精密的機器：彫刻針十分銳利，在磨針機上磨針的時候，要利用顯微鏡才能調節度數和檢驗質量；針的迴轉速率1分鐘達8,000轉，在黃銅字模上彫刻深度達 $\frac{1}{8}$ 英寸，附有管理彫刻深度的測量計，精確度達 $1/10,000$ 英寸。

### III. 各種字模製造方法的比較 和我們應走的道路

從字模製造的發展史看，最早的是沖壓法；隨着電鍍銅版術的發明，而有電鍍法；其後本頓氏發明字模彫刻機，又帶來了彫刻法；近年有人提出鑄造法，不過還未脫離研究階段。

沖壓法、電鍍法、彫刻法3種字模製造方法比較：沖壓法所用的鋼質字種，壽命不長，每個只能沖壓出200—300個字模，如果靠手工彫刻，極為困難，非用字模彫刻機不可。漢字的筆畫一般都在12畫以上，不能利用“硬碰硬”的沖壓法，日本目前這方面的研究僅限於很少數筆畫不多的字和標點符號。

彫刻法是現代字模製造技術發展到最高的成果，生產率高，質量也高，產品既精確，又耐用。一般電鍍字模的壽命只能生產30—40萬個鉛字，而1個刻字模比電鍍字模可以生產出15—20倍的鉛字。我國直到現在還沒有這種字模彫刻機，字模生產一般不能利用電鍍法。

就算利用電鍍法，我們還是落後的。日本已普遍用黃楊木彫刻字種，採用間接電鍍法(蠟型電鍍)；我們還停留在彫刻鉛質字種，採用直接電鍍法；日本已經普遍採用照相縮放的方法，拍攝成各種大小的字樣，貼在木塊上，然後加工彫刻；我們習慣於憑個人的技術修養，在沒有字面的鉛塊上手工彫刻。

不難設想，在平滑反光的鉛塊上，憑空刻出筆畫繁多的反體的字，而彫出來的成品，排比起來又要體材一致，整齊畫一，符合質量要求，是多麼容易的事。全國各地印刷廠從事臨時刻製鉛字的工人並不少，據說能符合彫刻字種技術要求的不到10人(據日本印刷業的報道，在東京，這樣的技術工人也只有10人)，每人每個工作日彫刻字種的定額只有8—10個；何況彫刻出來的成品，排比起來，不可能每個都符合質量要求，通常要作多次的返工，就在好幾個成品中最後選定1個。

1955年5月1日起，北京各出版單位開始試用第一批簡化漢字字模57個37種(共2109個字體大小不同的字模)，絕大部分就是由技術工人憑空彫刻在這樣落後的手工業生產情況下產生出來的。

日本的字模製造業，過去一向用的是電鍍法，年有80%被彫刻法代替了。我國的字模製造技術處落後的状态，必須開始利用字模彫刻機，走機器化的道路，那是肯定的；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防止盲目冒進，克服不切实际的空想。

據了解，全日本目前的字模彫刻機生產，每過5台，可能供應我國的數量極有限；這種精密的價格很高，每台約達人民幣10,000元，在國家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的時期，過多地輸入這種機器是不適當的；而且向日本訂貨至少要在1年後才能到貨，在初期，需要化一定的時間培養工人，才能掌握技術；這種機器每天只能生產200—300個字模。因此，“遠水不能救近火”，機器裝備雖然先進，不能迅速地解決我們迫切的問題；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們的鉛字改革仍不能不依靠手工業的生產——電鍍法來解決。具體的辦法是：

〔1〕必須採用先寫字樣，照相縮放，然後加



的方法，代替憑空彫刻的方法。只有這樣，才可以服目前各號字樣不一致和返工浪費的缺點，並且大提高生產率。

[2] 改用間接電鍍法，用彫刻木質字種的方法代彫刻鉛質字種的方法。既然具備照相縮製的字樣，刻木製圖章的技術工人也很多，那就有可能不必完依靠所謂全國只有10多個的精通白手彫刻鉛字的人來擔負全部任務。

[3] 我們一方面進行鉛字改革，另一方面各地報印刷廠要添置全副字模，是一種極不合理的浪費。國營企業目前需要添置全副字模，完全可以用調配的方法解決：字種彫好後，翻製字模的工作，讓私營鑄字所來做，就可以克服簡化漢字字模供應的現象。

[4] 我國鑄字業一向掌握在私人資本家手裏，從資本主義生產，為着節約銅材，使很少數的字模能分生產大量的鉛字；為着節約鉛材，使印刷廠減少字積壓，鑄字業就有實行統一生產、集中供應的必然。主管部門應該把私營鑄字業組織起來，走國家資本主義的路。

[5] 銅是重要金屬，又是國防物資，政府正在號召各行業節約用銅，並且已經創造了不少經驗。鑄字也應該以實際行動響應政府號召，積極研究在字模中節約用銅的方法，如：

[A] 字模的黃銅部分改用其他金屬；

[B] 1塊字模上面安排幾個字（現在是1個字）；

[C] 利用活動字壳，全部節約字模的黃銅部分。

#### IV. 結語

漢字的筆畫繁多，結構複雜，不能利用生產率最

高的機械化的沖壓法來製造字模。漢字的字數太多，1副字模的數量相當拉丁化或者斯拉夫化拼音文字字模100副，使得我國排字技術直到今天還不能走上機械化的道路；而且字體種類貧乏，不能像一般外國出版物那麼豐富多采。僅僅從出版、印刷的角度看，也足以表明我國文字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由於漢字的數量繁多和字模刻製過程的複雜，如果對每個選定為簡化對象的字，分部簡化——先簡化聲符，將來再簡化義符，是不合算的，必然要引起人力、物力很大的浪費。如果在字數上，把需要簡化部首、偏旁的字實行一次全盤簡化（約四五千個），不得不等待全國各地所有的字模都改製完成後再開始推行，實際上也就要把簡化漢字的日程至少推遲一兩年。因此，有計劃有步驟地分批簡化的方針是正確的。

有些人說簡化字不好看，如果指的是新近刻製的簡化漢字字模，在出版物上同原有的字模夾在一起，有些字顯得大小不均，粗細過度，字形生硬，那是事實。這些字模大部分是憑刻字工人白手刻出來的（反體），同是出於1個人的手，也很難保證所刻的字體完全一致，協調均勻；就算是用照相縮放字體的方法刻製出來，不同大小的同1個字體裁是一致了，可是客觀上各個印刷廠的鉛字規格並不統一，新舊夾排在一起，仍然是難以完全適應。

由此可見，在我國字模的改造工作中，採用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是難以令人滿意的；而且工具規格的混亂，也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要求不相容，唯一的辦法是通過簡化漢字這一工作，由政府有領導、有計劃地實行字模的全盤改造，逐步實現我國字模規格的標準化，製造、供應的集中化。

# 《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的优越性

丁 勉 哉

按：本文是作者在華东師範大学中文系 1955 年 8 月 22 日召開的漢字簡化討論會上的發言。我們把它摘要發表在這裏。——編者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 1955 年 1 月間公佈了一個《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在祖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廣大人民又迫切要求學習文化的今天，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製訂了這個草案是非常及時的，非常有意義的。

這個草案公佈以後，全國各地尤其是文教機關和各級學校已經展開學習，大家都感到興奮。多少年來人們所渴望的理想——拼音文字將通過漢字簡化這第一步工作而逐漸成為現實。我在學習中体会到這個草案具有很高的优越性。底下就分三點來談。

第一，是具有明確的方向。

過去談文字改革的人對於改革的方向有過多年的爭論。有些人以漢字為國寶，根本反對拼音文字。另外一些人他們一說起文字改革就是主張馬上把漢字廢除掉，一步跳到拼音文字去。這兩者當然都是不對的。

這次公佈的草案具有明白正確的方向性，它把漢字簡化列為文字改革的第一步，放在走向拼音文字的總目標之下來進行。它不是一步跳到拼音文字去，也不是單單簡化一些筆畫，字數就算了事，它不是急進的廢除漢字的做法，也不是保守的改良漢字的做法。由簡化漢字過渡到拼音文字是一個矛盾的統一，是一個辯證的發展過程。

毛主席說：“文字必須在一定條件下加以改革”。又說：“文字改革要走世界各國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個偉大的指示，就是我們文字改革的最高指導原則。這個方案正體現了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細緻深入地學習這個草案，緊緊把握着文字改革的正確的方向。

第二，這個方案具有廣泛的羣眾性，同時又在羣眾性的基礎上有所提高，再回过头來交給羣眾學習使用，所以它是切實可行的。

文字原是羣眾創造的。幾千年來多少次或大或小的字體變革，也是在羣眾力量的推動之下，逐步往前發展的。歷代王朝為了便利自己的階級統治，曾經壟斷過文字，把它當做愚弄人民的工具，人民羣眾自

己所創造的文字，往往被剝奪，自己沒有機會學習，自己也不能使用文字。文字一旦脫離了廣大的人民羣眾，它也就很難正常地發展了。但是羣眾的力量無窮，羣眾的智慧也無窮。儘管一時被抑制，不可能完全扼殺，於是在士大夫干求祿位的“正體字”以外，人民羣眾自己手頭創作的“俗體字”仍然不斷地孳生成長起來。儘管那些幫閑的御用文人學士想盡方法來排斥俗字，而俗字仍然蓬勃地活着，直到人民民主的時代才翻身！從羣眾創造的俗字的結構規律上看，像借音字和改簡音符這些，可以看見人民羣眾是如何地渴望有一套簡便的文字工具，如何地表現了高度智慧，擺脫表形表意的舊文字而換上一套表音的新文字。但是，這在過去是完全沒有可能實現的，惟有在人民民主的新時代，才可能給一向被歧視被排斥的俗字以合法的地位。這個漢字簡化方案明白規定了以“約定俗成”為原則，這就充分表現了方案本身具有廣泛的羣眾性。從 798 個簡體字看，絕大部分是全國已經通用了的，是千百年來廣大人民羣眾的創造。草案製訂後，公開向全國各方面廣泛徵求意見。這些事情說明這個草案不僅在選定簡字的原則上具有廣泛的羣眾性，而且在討論擬訂等實際工作當中也具有廣泛的羣眾性。這個來自羣眾的草案，將來正式公佈，回到羣眾中去，一定為羣眾所樂於接受。

過去的俗字既然被歧視被排斥，純粹是羣眾自發的產物，沒有自己的政權來支持，也沒有正確的指導，這是歷史條件的限制，無可避免的。因此也帶來了散漫和缺乏規範化的缺點。現在根據人民羣眾的願望，有意識有計劃地加以研究整理，這就把過去自發的工作轉化為自覺的運動。發揚了簡字的優點，克服了原有的缺點，成為統一的規範化的文字。正式公佈以後，將大大地鼓舞廣大羣眾學習文化的熱緒，大大地增加廣大羣眾學習文化的便利。同時有力地推動科學文化的提高與發展，有力地幫助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進行。



有人說，798个簡字当中有不少面目生疏，看了認識的，恐怕未必有什麼羣众基礎。並且還說這樣法倒不如原來的繁体字好寫好認。這樣看問題的，有少數或个別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往往只有點微小的生活體驗，接觸的天地不大，又不很關心众，难免以自己狹隘的主觀看法代替了客觀現實，是就把一些在羣众当中久已通用的簡字，只要自己會見過就說它是生造的，進而否認整个方案的羣众性，這都是不對的。要認識簡字的羣众性必須先清自己思想上的主觀主義，衝破生活上的局限性。不在羣众立場而只站在知識分子的个人立場，那麼這羣众性始終体会不到的。

第三，这个草案具有实事求是的现实性。

这个方案是实事求是的。它的现实性是和它的方性与羣众性相联系的。因为有了明确的方向才有可规定出切合现实妥善可行的办法，又因为方案具有广泛的羣众性，它就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草案的现实性具体表现在它周密地考虑到各个方面：人力物力時間的这些客观条件，印刷体和手寫体的配合运用，知識分子可能有的困难和初学文化的人应该有的等等。草案的第一表笔画的简化，第二表字數的简化，第三表寫法的简化，三个部分是互相配合，密切联系着的，若把任何一个部分孤立起来看，就很难得出草案的现实性。

有人說，為什麼要把印刷体和手寫体分開处理呢？如果把部首声旁的简化一起放到印刷体的简化裏面，使印刷体简化的範圍更擴大，又可以使印刷和手的两种字体統一起来，增加學習上的便利，豈不更一些嗎？这种想法当然不是沒有理由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也曾經考慮过的。但是有一个实际的困难，就现实条件不可能這麼做。章毅同志在《略談漢字简化工作》（《中國語文》1955年1月号）那篇文章裏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來說明这个道理，就是为了我們明白这个工作必須照顧现实。章毅同志指出印刷体和手寫体需要分開处理是根据在北京的出版教育新聞三方面的五十多位負責同志的意見，歸納起來，的有三點：一是改鑄大量銅模，人力物力和時間有困難；二是草書笔画会打乱部首系統，反而增加字結構的單位；三是在印刷上宋体夾雜草書，甚至宋半草，形式上不調和。这些情况全都是非常具

体，非常实在的，因此我們現在只能而且也必須把印刷体和手寫体分開处理。

印刷体和手寫体分開处理僅僅是事情的一面，另一面就是統一运用。單从分開处理看，固然会使一部分字的两种字体不相一致，但也不一定因此就增加多少麻煩。再从两个表相联系統一运用上看，那就会知道同样可以達成简化範圍的擴大，同時又能給國家節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为文字改革工作爭取時間。羣众要求學習的愿望和國家建設的需要，都不許我們拖延時間。这样做法是实事求是的，應該擁護的。比如說三點水（氵）这个偏旁，尽管印刷体仍然保留三點，手寫体却作一筆（乚），我們在教學当中可以告訴学生照手寫体來寫，很容易学会。2,500个常用字当中，三點水旁的字共有126个，單以偏旁改簡來說，这就普遍獲得簡化了。不用改鑄銅模，又不要等待時間，一下子就可以進行简化工作，实在是照顧现实的好办法。

至於方案所選定的簡字以及其他細節方面是不是完全適當而一點問題都沒有了呢？那当然不是的。这正需要大家展開討論，多提意見，使它更完善更充实。因不屬本文範圍，這裏不詳談。

最後，我想再提一提我們文教工作者尤其是人民教師對於这个漢字简化方案應該做些什麼工作來推動它往前進展，一直过渡到拼音文字去。主要的似乎應該包括下列幾點：

1) 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和整理漢字简化。在方案正式公佈以後，要密切注意各方面使用簡字的具体情况，善於發現並分析各种因使用簡字而發生的新問題，並及時總結經驗，提供中國文字改革委员会参考。文字改革是大家的事情，要靠大家都主動地熱情地投入工作中去，推動它，完成它。

2) 要注意簡字的規範化，提出推行已公佈的簡体，防止隨便濫造，免得發生字体的混亂。

3) 推行簡字必須以教師为中心，領導前進。教師本身須要以身作則，起示範作用。黑板書寫和批改作業就得一律根据方案，使用簡体，不要同新課本上的簡体發生分歧，免得学生發生困难。在開始階段，教師自己由於多年的習慣，可能有一些不方便，但是这个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想到这样做法對於兒童和成年文盲，對於祖國建設都有利益，也就会覺得很愉快了。

## 現代漢語語法研究 (七)

苏联 A.A. 龍果夫

## 動詞·前置詞

103 最後，在動詞之內佔據特殊地位的是那些能有實詞和虛詞兩種作用的動詞，就是那些動詞·前置詞。

現代漢語裏有一個傾向，把這一類型的某些動詞完全轉變為虛詞，轉變為前置詞。可以設想這種過程的兩個基本階段。

第一階段 動詞既有實詞的作用，也有虛詞的作用，當作實詞用的時候，它保持它的聲調，並且很重要的，可以有形態構成，在這方面一點也不異於一般動詞。例如“用”和“到”可以說“我用‘的’東西”，“到‘了’北京”。當作虛詞用的時候，這些動詞沒有獨立的聲調，並且不能有形態構成。這類動詞的實詞的和虛詞的作用（“使用”和動作工具的標誌，“到達”和前置詞“到”等等），語義上是十分接近的，並且他們意義上的統一性也為說話者所清楚地意識到。試比較，例如，這兩個都表示“用手打他”的同義的句子：

拿<sup>4</sup>着手打他。

拿手打他。

動詞“在”在這方面是很有意思的。在現代漢語裏，它有兩個基本意義：“活着，存在”和“在一定的地方”。在第一個意義上，動詞“在”是實詞——它有自己的聲調，並允許有形態構成，例如：“父母還<sup>4</sup>在‘着’”，“他<sup>4</sup>在‘的’時候”。在第二個意義上，“在”是半實詞性的動詞，保持自己的聲調，但是已經不容許有形態構成：可以說“他<sup>4</sup>在‘北京’”，但是不能說，比如，\*“他<sup>4</sup>在了‘北京’了”。除半實詞“在”外，在現代漢語裏我們還可以找到它的虛詞的變體——動詞·前置詞“在”，它不僅不容許有形態構成，而且也沒有自己的聲調。試比較，例如，“他<sup>4</sup>在‘北京’”和“他<sup>4</sup>住在‘北京’”；不但這樣，在許多方言裏，虛詞“在”的輔音都發生了變化，不讀 *цай* 而讀 *дай*。動詞·前置詞“在”的意義也相應地變化了——它不僅有“在什麼地方”的意思，而且隨着主要動詞的意義，還可以有“到什麼地方”的意思。例如：

把這些東西放<sup>4</sup>在桌子上。

動詞·前置詞“在”的意義範圍的擴大，在熱河和北方方言中更進了一步。在那裏這個前置詞不僅表示“在”和“到”，而且還有“從”的意思，和前置詞“打”作用合一了。例如：

他是<sup>4</sup>在(цай|дай|да)哪裏來的。

第二階段 動詞完全轉到虛詞一類，就是變為前置詞。它不容許有形態構成，一般沒有獨立的聲調，並且在它的輔音和元音上常常發生變化；例如，賓語的標誌的前置詞“把”在歷史上是和動詞“把”(把握)相聯系的，但是在山東的一些方言裏讀 [ma]，在山西的一些方言裏則有時讀 [ba] 有時讀 [bə]，前面的詞的元音為轉移：說“把<sup>4</sup>他”的時候是 [ba]，說“把<sup>4</sup>我”的時候則是 [bə və]。

這個動詞·前置詞的意義範圍也擴大了，這可以从下面的事實很明顯地看出來：我們不僅可以說，如，“把<sup>4</sup>這些東西拿來”，還可以說“他<sup>4</sup>把<sup>4</sup>點了一點”。

104 在漢語中，前置詞的形成過程不僅按照實詞為虛詞的途徑來進行，而且也通過另一途徑進行，就是把一個詞的虛詞作用從它的實詞作用那裏離開來，結果是除原來的實詞外，產生了一個獨立虛詞。

在這方面，動詞“給”的變化是很有意思的。在學語言以及熱河或河北這一類型的方言裏，動詞“給”既有實詞的作用，也有虛詞的作用，即也用作間接的標誌（兼有 *dativus commodi* 和 *dativus incomm* 的意義）。動詞“給”的虛詞和實詞的意義上的統一為說話者所清楚地意識到。在甘肅和陝西這一類方言裏，這種統一性被破壞了，我們所遇到的已是同一個詞的兩種作用，而是兩個只是歷史上不同的詞——前置詞和動詞了。這可以由下列證明：在甘肅和陝西方言中，在同一個句子裏可同時又用前置詞“給”又用動詞“給”，這在其他方言是不可能的。不但這樣，在甘肅方言中，一個動詞同時帶有一個限制詞素“給”，表示動作是為了某又帶有一個半虛詞性的派生動詞“給”。換句話說，這裏可以同時包含三個“給”，例如：



給他給給了。

105 動詞·前置詞又可以分成兩個主要的類。屬第一類的是表示空間和時間關係的動詞·前置詞，例如在(цай|дай)，打，从，到，往”，等等；不表示這關係的動詞·前置詞構成另一類，例如“把，給，叫，和”，等等。它們之間的形式上差別，大家都知在於第一類動詞·前置詞能够和帶有後置詞的名結合(§ 46)，而第二類動詞·前置詞則不能够。這兩類動詞·前置詞都有一系列个别的意义上和上的特點，但是這些特點的考察不在本書範圍之內。在這兒我們只指出兩件事：1)在現代漢語裏，有詞“給”和“被”不僅作為前置詞，而且也作為具有態意義的動詞語頭的趨勢；2)動詞“在”不僅用作詞，而且也用作時間範疇的形式標誌——相對的時或說話時的現在時。動詞“在”的這種用法我們面還要討論(§ 141)。

### 語氣·時間體系

103 我們在觀察事物範疇的時候，曾經說明，漢的名詞本身並不指示各个个别的事物，而是指示的事物，作為一類的事物，像俄語裏的“домашняя”(家禽)和“красная рыба”(紅魚)(§ 16)。

漢語裏的動詞也有類似的情況。動詞詞素本身不關於“時”或“態”或“體”的任何暗示，也沒有“有(именитое)”的性質，這就是為什麼在漢語中為了在的句子中，作為有定謂語，動詞須要以一定的辦得形式構成的原故。這種形式構成不是非用形態手段不可，也可以用詞彙·句法手段，例如在及詞後面加賓語；還可以是零——在命令句裏。

在某些方言中，由動詞作成的謂語要求一定的形的構成，在這樣的方言裏，賓語的構形作用自然居第二位。對於“他 作 啥着呢？”(陝西)這樣題，這些方言裏不能用“他 看 報”等作為完整好來回答，必須說“他 看 報着呢”或“他 看着 跟說“他 走着呢”等等相似(§ 133)。

能起形式構成的作用的不僅僅是放在動詞詞素後東西，也可以是放在動詞詞素前面的東西。對於“从前 不是 抽煙的-嗎？”這樣的問題，可以“前 也 不抽”來回答，這兒動詞不帶賓語，而動詞“也”和否定詞“不”作為形式構成。

否定詞“不”作為動詞謂語的構形成分的作用，在謂語永遠是形態學地構成的方言(甘肅)中很鮮明露出來：人們說，“我 抽 煙呢”(有抽煙的習慣)“我 不 抽 煙”(沒有抽煙的習慣)(§ 110)。

文學語言中也有與此相似的例子：

“阿Q 於是 撒了 石塊，一面 走，一面 嘆，而且 想到 這裏 也 沒有 什麼 東西 尋，不如 進 城 去……”(魯迅，《吶喊》)。

動詞的“形式構成”在這裏是靠“一面……一面……”來實現的。

在甘肅方言中，這樣的一些助詞的構形作用極其明顯。例如，在這些方言中，人們說“他 高興呢”，“他 害怕呢”，謂語必須加語尾“呢”，可是在“走的 他 又 害怕，又 高興”裏，動詞缺少後加的構形成分，就因為具有前加的構形成分“又……，又……”。

“他 慢慢的 走”，“他 就 走”，“他 走了”，“他 走近 裏櫃”，“走！”，這些都是完整的，都是句子。相反，簡單地說“他 走”，在現代口語裏是不能作為完整的形式即句子的，除了用來回答選擇性的問題“他 走 不 走？”但是說，例如，“我 看 他 走”，是完全可以的。因為在這兒“他 走”不作為獨立的句子，而作為更複雜的陳述中的一部分，作為動詞“看”的賓語。

在這一基礎上發展出來現代漢語裏動詞謂語的必不可少的形態構成，並且形成了動詞的“時”的體系。我們現在就接着研究後一問題。

### 時間範疇

107 在現代漢語中，時間範疇形成兩個系統：各種過去時的系統和“過去時——現在時——將來時”的系統。

從下面的表中可以明白地看出，詞素“了”(或者，更正確地說，兩個同音的詞素)是一個焦點，在這個焦點上，在“過去時——現在時——將來時”系統內發展出來的語氣助詞系統和具有“體”的性質的各種過去時系統交叉起來。

各種過去 時系統 ↓			
	(-)了	-着呢	-呢
	-過	← 在時的系統內發展 起來的語氣系統。	
	-的		
	-來(着)		

## 語尾“了”“過”和“來(着)”

108 過去時系統用語尾“了”，“過”和(不是所有方言)“的”，“來”(着)來表現。在這個系統之內，中心地位是屬於“了”和“過”，這是我們首先要談到的。

動詞語尾“了”和“過”形式上的特徵是：它們直接結合於動詞詞根。“了”表示完成的結束的過去時，例如：

我 來 了。

張 老 三 死 了。

我 等 了 你 兩 個 鐘 頭。

這個語尾所固有的完成性和結束性的意思，當談到在另一動作出現以前應該完成的動作時(將來的過去時)，特別明顯的表現出來。例如：

來，來，來，我們 吃 了 飯 再 談 吧！

他 答 應 了，我 就 答 應。

語尾“過”跟這個相反，表示非完成的，非結束的，容許重複的可能性的過去時；它指明動作在不確定的或遙遠的過去發生過某些次數，但不容許轉移到將來時裏面去，例如：

你 去 過 上 海 嗎？——去 過 一 次。

那 女 子 我 也 見 過 一 兩 次。

你 小 時 候 讀 過 四 書 嗎？——讀 過 的 ①。

語尾“了”和“過”之間的不同，也表現在否定的結構裏。“去了”的反面是“沒 去”，意思是還在這裏；但是“去過”的反面是“沒 去過”，意思是“從來沒有去過”②。

這種相應關係可以用下面的表來表明：

肯定形式	……了	……過
否定形式	沒 …	沒……過

語尾“過”和“了”在歷史上是跟動詞“過”(經過)和“了”(了結)相聯系的。

語尾“過”的體的基礎由下面的事實可以看出。漢語裏，每個表結果的動詞都具有可能式(§ 94)：例如跟“看見”相應的有“看得見”。但是沒有跟“看得過”相應的非可能式，也就是說，沒有“\*看過”這一形式，因為詞素“過”在這種情形下已經喪失了實詞性，而轉變為非完成性的過去時的標誌了。

語尾“了”(-лэ || -лэ)的體的起源不會引起懷疑的。它跟作限制成分的詞素“了”(-ляо || -лэ)的聯系甚至表現在語尾“了”(-лэ||-лэ)，往往特別是在帶賓語的動詞之後，讀作完全沒有弱化的音，也就是讀作 лэо || лээ 這一點上。例如，除“吃了(лэ)飯”之外，還可以聽到同樣意義的“吃了(ляо)飯”。

語尾“了”的體的起源，它跟某些作限制成分的詞素之間的平行現象，很好的表現於複雜的整體——子中，例如在這樣的場合：

阿墨 起來，把 衣裳 穿 上，把 臉、脖子

洗 了，把 茶 喝 了，走 了 學 堂 裏 了。(甘肅)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明顯地看到，“了”在動詞“喝，走”之後所起的語法作用跟限制成分詞素“來”“上”在動詞“起”和“穿”之後所起的語法作用相同：者都表示動作的完成、結束，所不同者只是“了”不含有任何詞彙意義，而詞素“來”和“上”具有詞彙內容，雖然很微弱，但畢竟是有。

除此以外，在漢語中還存在着表示過去時的特種的加“的”的形動詞(副動詞)的形式，關於這一點，以看§§ 79 和 116—119。

109 語尾“來(着)”在過去時系統中佔有相當的地位。它在歷史上，很明顯地跟限制詞素“來”相聯系，因而它不是固定地直接放在動詞後面，它可以賓語或所謂附屬主語跟動詞隔開(§ 99)。例如：

我 今 天 看 見 王 同 志 來 着。

這個語尾的語法意義為它的起源所規定。跟動作帶向遙遠的或不確定的過去時的語尾“過”不同，尾“來(着)”用於動作屬於不久的過去的場合。例如：

我 昨 兒 又 出 城 來 着。

方 才 我 秤 了 一 斤 肉，攔 到 桌 子 上，

沒 有 了 呢？——哎 呀！八 成 讓 狗 吃

我 看 這 狗 上 屋 來 着。

你 聽 見 他 睡 夢 中 說 話 來 着 嗎？

語尾“來(着)”和語尾“過”在另一關係上也對着：它也可以表示遙遠的或不確定的過去時，但是

① 由於它的意義，語尾“過”主要是和動詞一起使用而很少和形容詞一起使用。後者只見於特別相宜的上下例如這樣的句子，“去年 一 天 也 沒 冷 過”，這種形是不多的。

語尾“了”的情形也相類似。像“天氣 冷 了”這樣的句子，它包含的不是動詞語尾“了”而是語氣助詞“了”，後者的意義完全不同。

② 我們應該指出的是現代文學語言中有一種趨勢：語尾“過”用得跟語尾“了”相似，表示過去結果時。下列句可以說明，這裏第一個動詞加“了”，第二個和第三個動詞加“過”，最後，第四個和第五個動詞又是加“了”。

……看 他 殺 了 多 少 人？打 過 多 少 人？

逼 死 過 多 少 人？詛 窮 了 多 少 人？逼 走

多 少 人？(趙樹理，《李家莊的變遷》)

對於語尾“過”的這種用法，H. H. Коротков 引起注意，附此誌謝。



尾“过”不同，屬於遙远的过去的不是動作而是狀，用这个意义的“來着”構形的謂語不限於動詞，也

以是别的詞類。例如：  
早先 蒙古 兵 都 有 一 張 弓 來。(熱河)  
起頭 這 營子 人家 不 少 來着。(熱河)  
那 二 年，你 幹 什 麼 來？——給 人 家 看  
牛 來。(山東)

尾“來(着)”用作不久过去的標誌，限於不大的一个的方言。在甘肅的一些方言裏这个語尾(音 лэй)們用於所指不是動作而是狀態的場合，在關於过去各种敘述如傳記，民間故事等等裏面是習見的。語“來”在甘肅的一些方言中可以用於任何詞類作成的語裏。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因为所指不是動作而狀態，表動作的動詞(§ 921)必須預先加上加語・詞語尾“的”。

- 試举一些例子：
1. 用非動作動詞作成的謂語：  
那會兒 有 一个 老婆兒 來，老的很。
  2. 用動作動詞加上語尾“的”作成的謂語：  
他 一年-四季 唸 書的 來。
  3. 用名詞詞組作成的謂語：  
三十 年 之前，我 是 一个 年輕 小伙子 來。

### 否定詞“不”和“沒”

110 現在我們來談一談“过去時——現在時——來時”的系統。

这个系統在否定的句子裏是藉助於否定詞“不”和(有)來表示的，這對於肯定的句子裏的類似的系的形成也發生了很大的促成性的影响。很自然，否詞的作为動詞謂語的語頭的語法作用，特別清楚地現在那些用動詞作成的謂語要求形态地構成的方言。否定詞・語頭在否定句裏所起的語法作用跟語尾肯定句裏所起的語法作用相同——它們把未經形式成的動詞詞素，从動作的名称变成形态上完成了的体，变成有定的謂語。例如，在甘肅方言中，可以完整形式來說的是“不 走”，“走呢”，“沒 來”，“了”，但是絕不能簡單地說“走”或“來”。

否定詞“不”或用於現在・將來時，或用於將來時。現在・將來時，它表示習慣性動作的否定；用於來時，除未來的意思外還帶有不願意作这种動作的色彩。例如，“我 不 抽 煙”這句話，在不同上下文裏，可以是“我不会抽煙”的意思，也可以是“這會兒不抽煙”，“我不想抽煙”的意思；“他 不 走”，可以是“他不会走”的意思(例如談到很小的小孩)，也可以是“他這會兒不走”，“他不願意走”

的意思。

相反，否定詞“沒”(мэй, 方言 мо, му)或用於过去時，或用於說話時的現在時③。在後一种場合，謂語或是必須加上表状态的標誌即語尾“着”(чжэ, 方言 -дэ, 參閱 § 133)作为形式構成，或是(假如謂語裏包含賓語或附屬主語的話)必須加上語气助詞“呢”(на || нн)作为形式構成。例如：

他 沒 來。  
我 沒 看見。  
我 沒 唸 書。  
他 現在 在 炕上 躺着 沒 躺着？  
我 到 他 家裏 去，他 沒 唸 書 呢。

否定詞“不”和“沒”之間的相应關係，可以用下表來表明：

过 去	現 在		將 來
	說 話 時	習 慣 性	
沒...	沒 ...着	不...	不...
	沒.....呢		

在肯定的句子裏跟否定詞“沒”对应的是語尾“了”；跟否定詞“沒.....着”对应的是表示状态的語尾“着”加上語气助詞“呢”(某些方言裏是語尾“着呢”)；最後，跟否定詞“不”对应的在一些方言裏是形态地構成的動詞，而在另一些方言裏是語尾“呢”。例如：

他 來了 沒來？——來了。  
門 鎖着 沒 鎖着？——門 鎖着 呢。  
你 抽 煙 嗎？——我 不 抽。  
你 去 不 去？——我 去 (呢)。

這兩個否定詞之間的許多个别差異都跟这个相關联。

否定詞“沒”不容許動作轉移到將來時裏去，但是用否定詞“不”的時候，動作轉移到过去時裏去則是非常普通的。例如：

他 不 說 “是”，也 沒 說 “不是”。(茅盾，  
《子夜》)④

③ 看 W. Simon 的論文《Zur Bildung der anti-thetischen Doppelfrage im Neuhoehchinesischen》，Sinica, 8卷(1933)5—6号，218頁。

④ 在这本小說的俄譯本裏，這句話譯成“Он не отве-тил ни да, ни нет”(他没回答是，也没回答不是)，这是不完全符合原文的。

你可不抽烟哪？——謝謝，我不抽。

——你从前不是抽烟的吗？——从前也不抽。

否定詞“不”，由於它本身的意义（否定習慣性的動作），跟表示結果的動詞用在一塊的時候（§94），總是具有語气的意义。它或者插入動詞之中，表示不可能引導動作達到某種結果（看不見），或者，比較少見，放在表示結果的動詞前面，仍然具有不願意做這種動作的語气意义⑥（§94）。試比較：“說不下去”（不能繼續說下去了）和“不說下去”（不願意說下去）。

否定詞“沒”恰恰相反，因為它本身的意义裏不包含否定延續性動作的因素，所以它跟表示結果的動詞用在一塊是很普通的：“沒拿來”，“沒寫上”，等等。

否定詞“沒”同這樣的動詞不同用或是很少同用，這些動詞由於本身的非動作的意义，不容許把它們限制在說話的現在時，因而也就不容許附加語尾“着”（§§128, 138）。

否定詞“不”和“沒”之間的區別不限於此。跟否定詞“沒”不同，否定詞“不”出現於兩個對比系統——在時間系統中“不”和“沒”對應，在語气系統中，它和像“就”，“才”，“還”，“也”等這一類型的半實詞的語气副詞對應。跟“不”相似，這一類型的副詞，如我們在下邊所看到的（§198），在句子裏都起着雙重作用，又是意义上的作用，又是語法上的作用：它們把未構形的動詞變為形態上完成了的整體，轉變為有定的謂語。這種相互關係可用下表來表明。

時		語 气
沒… 沒 …着	不…	
	就…	
	才…	
	還…	
	也…	
	等等	

111 否定詞“不”和“沒”之間的形式上的區別也與這個有關。否定詞“沒”具有意义相同的兩個變體——短式的“沒”和全式的“沒有”，而否定詞“不”則沒有兩個變體，因為在現代漢語裏，它不同動詞“有”用在一塊（不能說“不有”⑦）；可以說“沒來”和“沒有來”，但只可以說“不來”。在選擇式的問句的結尾，如大家所知道，必須用全式變體“沒有”：可以說“知道不（知道）？”但只可以說“他來了有？”或者“門鎖着沒有？”

在甘肅的方言裏，否定詞“沒有”在選擇式問句末尾有不同的形式構成，看它是表示過去時，還是示說話時的現在時而定。表示過去時的時候，說“有”（*моу*），表示說話時的現在時的時候說“沒的”（*меди*，顯然是來自“沒+有+的”<“沒+有+着”）例如：

他來了沒有（*моу*）？

雨這忽兒下着呢嗎沒的（*меди*）？——沒的。

在回答問題的時候，除“沒的”外，也可以說“有的”（“沒+有+着”），但意义是“還沒有”，例如：

你爹還沒回來呢？——沒有的。

（邵榮芬、鄭祖慶譯，呂叔湘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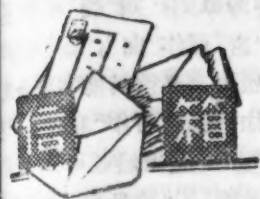
⑥ 看我的論文《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дунган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Тр. инст. востоковед. АН СССР, 27 卷，頁，1940。

⑦ 但是無論在方言裏或者白話裏，選擇問結構“有”都可以用（參看 § 35）。

七月号勘誤表

頁	欄	行	誤	正
6	左	26	声調符加在	声調符号加在
8	左	27	不容辨別	不容易辨別
8	左	倒 9	不存在。	不存在⑤。
				[註碼⑥⑦⑧順着改]
8	左	倒 2	這	⑥ 这
11	右	1	Tɿ	Tɿɿ
11	右	10	<l	ɰl
33	左	4	百性	百姓
33	左	8	分問子	分子間





## 對於漢語規範化的意見

丁 是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常碰到說得不通的話和寫得不通的字。甚至於在印出來的書報中，也能找到不少文字上的錯誤。這一方面是因為很多人在說話和寫文章時不注意語言的正確性，另一方面也因為現在還缺少一個大家接受的標準。為了確立一個文字標準，就需要進行漢語規範化的工作。

漢語規範化對於學校裏的語文教學會有極大的幫助。現在因為沒有一個大家接受的標準，語文教師分析文字，學生運用文字，教師批改學生的作業，都有一定的困難。在問題上，各語言學家的看法不同，一個學校裏面的語文教師的看法也不同，這就使學生不知道相信誰好。為了提高教學的效果，漢語規範化的工作是必須做的。

拼音文字是很多人都同意了。為了實行拼音化，也先進行漢語規範化。如果有許多語法和詞彙的問題現在沒有解決，在實行拼音化的時候就會遭到困難。隨便舉個例子來講，「和緩」和「緩和」這兩個說法總得廢掉一個，保留一個。怎樣拼寫成一個詞呢？

有人說：文字是決定於語言的；要全中國人都根據某一來說話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聽其自然。這種說法似是而非。文字固然來自語言，但文字反過來又能給語言以極大影響。能讀書的人的說話方法，難道不受書面上文字的影響？難道不是有很多句法和詞是從書本上學來的嗎？如果使漢語規範化，然後通過書報、學校和廣播，就可以使很多人都按照統一的標準寫文章和說話，或者說使很多寫違反標準的文字和不說違反標準的話。在我國掃除文盲工作完成以後，這個標準就有可能被全國人所接受。

漢語規範化並不是創造新的句法和詞，而是整理現在已經使用的句法和詞，也可以說是使漢語的已有的規律更趨更有系統，在文字的各方面得到進一步的貫徹。如個工作做得好，大家接受這個規範是應該沒有什麼問題的。

漢語在近百年來，尤其是在近三、四十年來，受社會生活巨大變化的影響，受外國語的影響，在句法和詞彙方面有很大的發展，這是好的，但隨之也產生一些混亂現象。規範化工作，至少可包括三個方面：句法、虛詞和常用詞。在句法方面要確定主要有那些結構。無主語的句子，省略部分的句子和主語謂語倒置的句子等結構也需要整理，因為現在有濫用這些結構的趨勢。

在虛詞方面，應該把各虛詞的用法說明，如「的」、「地」、的用法，有「比較」意思的虛詞的用法，現在都還沒有一個標準。

在常用詞彙方面，有許多詞的用法需要明確規定。如那些詞可以當動詞用（像「豐富」、「密切」等），那些又不能

（像「美麗」、「光榮」等）。又如「我們要引起警惕」中的這個「引起」是否用得對，也要有標準來判斷。這種用詞不當的情況現在真是多極了，不能再不管了。

在詞彙方面還要做一個工作，就是把同義詞整理一下，廢除不必要的同義詞，正如廢除不必要的異體字一樣。如前面提到的「緩和」和「和緩」，應廢掉一個，還有如「必」、「須」，「必須」；「因」、「因為」；「但」、「但是」；「今」、「今日」、「今天」；「京」、「都」、「國都」、「首都」等，各保留一個就夠了。在一字與兩字的同義詞中，應以保留兩字的詞為原則。

詞彙方面還有一個問題是省略說法用得太濫，如「美帝」、「匪特」等就是例子。把它們說全為「美帝國主義」、「土匪和特務」也麻煩不到那裏去。那些省略說法能成立，那些不能成立，是可以規定一個標準的。

詞彙整理的結果，應該是一部新詞典。這部詞典最好不是以字為單位，而是以詞為單位；不僅有詞義的解釋，而且有詞的用法。以後第一部拼音文字的詞典，就可以以這本詞典為基礎。

漢語規範化的工作要不斷進行，因為隨時都會有新的文字問題發生。最好有一些刊物和報紙經常做文字批評工作，指出錯誤的用法，肯定正確的用法。這樣才能避免是非不分，和一般書報讀者無所適從的情況。

漢語規範化工作是巨大而困難的。這個工作必須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集中全國最優秀的語言學家來進行。我建議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考慮這個問題。我國的語言學家，在漢語規律的研究上已經做了不少工作。可是他們大都還在單幹。他們如果能到一塊兒工作，發揮集體的力，恐怕成績還會好得多。

我是一個普通的幹部，在日常工作中常常碰到文字上的問題，往往因為無法解決而感覺得很苦惱。所以在這裏把我的意見寫出來，引起大家的注意。

## 對《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幾點意見

鮑幼文

現在正當《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印發全國、廣泛展開討論的時候，讓我來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1. 利用古代筆畫簡單的字來代替現在通行的筆畫較繁的字：如「鬚」、「鬚」、「塵」改用古體「胡」、「須」、「土」，這是很好的。但除了草案中所已經有過的以外，還有許多字可以利用。如「草」可作「艸」，「暮」可作「暮」，「集」可作「亼」，「愛」可作

“恣”，“慎”可作“脊”，“堆”可作“自”，“繁”可作“𦰩”，“範”不如作“範”，“冰”不如作“欠”。不过利用古字也要有限制，以免走上盲目復古的道路。怎样限制法呢？那就是原來筆画本很簡單，古字筆画也差不了多少的就不必改。如“上”不必作“上”，“下”不必作“下”，“四”不必作“三”，“五”不必作“乂”，“化”不必作“匕”。又古字字形容易跟其他字相混的就不要改，如“替”不要作“无”，因为怕跟“先”字相混，“無”不要作“无”，因为怕跟“元”字相混，“國”和“圖”都不要作“口”，因为怕跟“口”字相混；“貫”不要作“母”，因为怕跟“母”和“毋”相混。

## 建議簡化三个虛字

編輯同志：

關於漢字簡化，在文字改革委員會方面似乎就印刷出版上着想的，而考慮字的用法問題不夠。在《漢字簡化方案草案》上，只有“乾、繼”兩個字是从用法上來考慮縮小繁體字的使用範圍，其餘的都是機械地“一對一”地以簡字代繁字。其實一個字往往有幾個不同的意義，如果把比較常用的意義用簡字代替了，保留原字也沒有多大關係。从印刷出版業的校對工作者看來，每個字的意義就只能照習慣規定，不能改變範圍，要是用簡字代替它，就應該全部代替；否則寧肯不改。自然，在校對工作上這樣做是比較方便的。可是事實上為了分別類似字的用法，某些出版社還是不能不作出一些規定來，比方“分子、成份”之類。這在工作時免不了也要查考一下的。因此我想為羣眾利益着想，增加少數新的規定，應該是沒有妨礙的。

我建議把詞尾“兒”字改用“儿”代替，但“兒童”的“兒”字可以不改。把當虛字用的“的”和“是”改用“𠄎”和“尸”代替，但“目的”“的確”“是非”等詞兒中的“的”字“是”字可以不改。這種簡化的辦法也就是把虛字和實字分化，可以幫助人們了解語法。而且這幾個虛字常用性太大，是有簡化的必要的。

這個建議是否可行，希望文字改革委員會給以考慮。

敬禮！

陳大愚 1955年6月1日

2. 可以利用注音字母。這些字母本來也是古字，而且早已用為識字拐棍，一般小學生都能認識，草案中也已經拿“儿”代“兒”，拿“𠄎”代“私”了。另外，我覺得還有許多可以利用的：如“包”可作“𠔁”，“幕”可作“𠔁”，“突”可作“𠔁”，“考”可作“𠔁”，“運”可作“𠔁”，“唉”可作“𠔁”。這裏“包”字筆画不多，似乎可以不必簡化，但从“包”得聲的字很多，如“泡”“抱”“砲”“胞”“跑”“飽”“鮑”之類，簡化一個“包”字就可以連帶簡化許多字，不是很值得的麼？

3. 廢除不必要的偏旁，像草案中的“伙”作“火”，“佈”

作“布”之類是很好的。我覺得還有些字的偏旁也可以省去這些偏旁的取捨，以去形留聲為原則。如“徑”可作“徑”，簡寫作“至”，“構”可作“構”，“窗”可作“窗”，“簽”可作“簽”，“噪”可作“噪”。還有些字不能獨用，必須與他字聯合才能使用的，更可将偏旁省去。如“龔龔”可作“鹿盧”，“可作“昆侖”，“霹靂”可作“辟歷”（歷當然还可作“歷”），“鷓鴣”可作“嬰武”，“橄欖”可作“敢覽”，“蜻蜓”可作“青”，“蜘蛛”可作“知朱”，“芙蓉”可作“夫容”，但“枇杷”不能作“杷”，“珊瑚”不能作“册胡”，“蜈蚣”不能作“吳公”，因為與“杷”，“巴”與“杷”，“册”與“珊”，現在都不同音，“公”像是对人的尊稱，與虫名“蜈蚣”意義不協調。

4. 異體字的廢除是必要的。除第二表所列400字還有些字讀音相同，意思略有分別，但或者是這種分別細微，或者是這兩個字（至少是其中一個字）用途不廣，為也可以當作異體字來處理。如“編”和“篇”，“需”和“聯”和“連”，“效”和“効”，“盪”和“蕩”，“週”和“周”，和“激”，“摧”和“催”，“製”和“制”，“彌”和“滿”，“齋”，“急”和“亟”，都可廢一留一，把筆画較繁的廢除，筆画較簡的留着。寧可讓一個字包含幾個意義，不能讓同一個意義和讀音。

5. 有些字簡化得還不夠，“肅”作“肅”不如作“肅”，“肅”聲的字如“肅”“肅”“肅”的半边都可作“肅”。“節”作不如依照它的古體作“口”，从“節”聲的“竊”也可作“豎”作“豎”不如作“豎”。“鑽”作“鑽”，不如作“鑽”。廢“鉤”存“鉤”，不如兩廢而並於“勾”。去“稭”存“藁”，“僥”存“微”，去“磚”存“磚”，去“洵”存“洵”，去“騰”存去“盤”存“碗”，去“筋”存“著”，去“館”存“館”，這些字上面一個筆画少，下面一個筆画多，却都去了簡的留的了。這就該互換一下，把筆画簡單的留下，筆画較繁的廢除。

6. 用同音字代替是一個好法子，但要極端嚴格。同韻同之外，調也要相同，還要以那個字的意義與所代相衝突者為限。草案中以“仆”代“僕”，而“仆”“僕”不同不如以注音字母“x”代“僕”。以“咀”代“嘴”，而“咀”同音，不如省“嘴”作“贅”。以“适”代“適”，而“适”同音，不如以“式”代“適”。又如以“召”代“招”，以“肖”代“召”，“肖”是去聲，“招”“蕭”是平聲。以“斗”代“鬥”，“上聲”，“鬥”是去聲。以“侯”代“侯”和“候”，“侯”“候”是去聲。以“于”代“籲”，“于”是平聲，“籲”是去聲。覺得“招”字可以不動。“蕭”字依“蕭”“嘯”等字例省作（尤其姓蕭的改作姓肖似乎不妥當。）“鬥”可以省作“侯”“候”也都不動，因為“侯”字筆画並不比“侯”字簡單，“侯”和“候”形、聲、義三者都不同，不必強合為一字。

7. 改動聲旁也要嚴格，雖不必像上條所說那樣聲調三者都完全吻合，但也要大致不差。像第一表用“寮”，把“遠”“僚”“療”簡化成“辽”“仵”“疗”是沒有問題，但另外一些字，如“瓊”簡作“璿”，“瓊”“京”不同音，不“璿”。“講”簡作“誼”，“井”無“葦”音，不如仿《說文》聲之例作“誼”。“藍”簡作“兰”，失去了聲旁難以認識，作“藍”。“穩”簡作“穩”，聲旁變成緩急的“急”，音義也相反，不如依照古體作“穩”。“隱”簡作“隱”，和“同”同樣不合理，不如作“警”。“甕”簡作“甕”，“公”“甕”



不如改作“嬰”。第二表廢“妒”存“妬”，不如廢“妬”存“妒”，因為“戶”和“妒”是疊韻，而“石”的今音則和“妬”相去

8. 要消滅混亂現象。第一表用“又”代替的偏旁太多了，作“邓”，“趙”作“赵”，“僅”作“仅”，“戲”作“戏”，“對”作“对”，“鷄”作“鸡”，“樹”作“树”，“聖”作“圣”，“鳳”作“凤”，“漢”“艱”“難”作“汉”“艰”“难”，“觀”“權”“歡”“勸”作“观”“权”“欢”“劝”，計改作“又”的偏旁共有十來種。这就極易發生混亂，又用“云”代替的声符也太多，如“攪”作“扞”，作“坛”，“壘”也作“坛”，“層”作“层”，“運”作“运”，作“飭”，“動”作“动”，除“運”“醒”外，其餘五個字都与声不合，这也是混亂現象。這些現象的發生，是由於舊時對於寫簡體字放任自流，而寫的人又都偏重意符，忽視声符，遇着形声字筆畫較多的，就都把意符原封不動，声符隨意用筆畫簡單的另一偏旁來代替，不管所採取的是否跟原字声音相合。今天我們是有組織有領導的來整字了，這些不合理的現象是否應該在整理之列呢？而且漢字是向拼音化的道路走的，像這樣隨便改動声符的怪字還值得保存呢？有人說這些字流行已久，是“約定俗成”的，自然不妨沿用。我却以為所謂“約定俗成”，只是在熟悉這些字的人看來是如此，若是從一個根本不認識這些字的人看來，却同樣是生字，有什麼“約定俗成”不“約定俗成”呢？今天簡化漢字應該替絕大多數正在開始和還沒開始漢字的成人和兒童打算，讓他們容易認容易記，這些雖是“約定俗成”而實際是粗製濫造的字，就顯得不大合適了。末了，讓我來把上面所談的作一簡單的總結：我是熱烈簡化漢字的普遍推行的。我竭誠擁護《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基本精神，一面簡化筆畫，一面簡化字數，一面簡化字音。我也同意草案裏的各項方法，但我主張有些方法應該補充，有些方法應該加以限制。最主要的是多多保留声符，假如更動声旁或者整個兒用同音字代替，都必須極端審慎，要使它尽可能地符合現代的標準讀音。異體字的字，也以所廢除的字和所保留的字声音完全相同為標準，完全相同而意义相差不遠，就都不妨作為異體字看待。一字數義，不能一字數音。一字數義，可以精簡字數，把幾個意义並在一音之中，但當集字成詞連詞成句的時候意义仍然不會混淆。一字數音，勢必因文字讀音上的歧異而影響及於語言，造成語言的混亂。在整理漢字的工作對声音方面要求嚴格，使初學的人易讀易記，認識一個字，同一声旁的許多字，就可能大致認識。

總之，只有對文字的声音部分特別嚴格，才能使學習的得到更多的便利。也只有這樣嚴格，才能給漢字拼音化鋪路。

## 我們擁護“漢字簡化”

許錫丰

我是一個部派語文教師，我完全同意“漢字簡化”，同時的學員（以成年的工農幹部為主）也同樣贊同“漢字簡化”，因為他們受“字”的約束最大，有些同志過去在寫作中，因不習慣沿用正楷字而打斷了寫作思路，有許多同志本慣用一些部隊常用的簡化字也被認為不合法了，硬要他

們再一本正經地從頭學起，這不是大大浪費時間嗎？最近我們學員在初中語文畢業測驗中（所寫）因寫簡筆字當成錯別字而不及格的也大有人在（如戰“斗”生“产”），这也打擊了工農幹部的學習積極性，使他們被正筆字所征服。總之，簡化漢字對普及文化是有好處的：一則可以清除那些靠寫古字賣弄玄虛的想法；二則也可以使工農幹部易於接受文化掌握科學知識。我覺得文字改革正如偉大的共產主義建設一樣，它不單只為了我們眼前的方便，而更重要的是為了大眾化和子孫萬代。

希望這種改革是穩步的而又全面的，在改革中應該防止一些語文教學上的混亂現象，如現在有些人就不願意學方塊字了，試問在文字沒有完全改革前我們能不學文化嗎？甚至有些人錯誤的連語法也不願學了，那就更不對了。我希望對文化有基礎的人不要怕麻煩，也希望剛學文化的人不要操之過急，這就在於我們如何掌握了，這個問題還是值得研究的。

## “打仗”“打架”是不是詞，

鍾授先生的《談怎樣分別詞和語》（《中國語文》1954年12月號），基本上合理地解決了某些動詞和詞組的界限這一問題。但是我覺得那篇文章對於“打仗”、“打架”的說法還值得商榷。

鍾授先生把“打架”、“打仗”當作詞組，我認為不夠恰當。

誠然，“打架”、“打仗”在語法上的特點與“吃飯”等詞組是相近的，但決不是“相同”的。

說相近，就是它們都可以在第一字後面加詞尾“了”（或“着”“過”等等），說成“吃了三碗飯”，“打了三天架”，“打了三年仗”等。

說不相同，就是“吃飯”等前後兩字拆開來都具有獨立詞的特點，而“打架”、“打仗”等拆開來，前後兩字不能具有獨立詞的特點。“吃飯”的“吃”和“飯”都可以做一定的句法成分，如“飯已吃過了”，“你吃什麼？——飯”。而“打架”“打仗”的“打”和“架”“仗”只有前者可以充當一定的句法成分，後者則不能。我們可以說“中國人民志願軍打美國狼”，但不能說“架已打過了”，“仗打了三年”，“架放在樓上”等等。

大家知道，“詞組”至少得要有兩個詞發生關係才能產生。而這裏“架”“仗”都不是獨立詞（不能充當一定句法成分），那末，有什麼理由叫“打架”、“打仗”是詞組呢？

同時，如果因為“打架”、“打仗”可以說成“打了三天架”、“打了三年仗”，不能說“打架了三天”、“打仗了三年”，因而就確定它們是詞組，那末，“革命”“鞠躬”等也都得叫詞組了。因為它們也可以說：“革了他的命”，“鞠了三個躬”，而不能說“革命了他的”，“鞠躬了三個”。這樣一來，“革”、“命”、“鞠”、“躬”都是詞了，那“詞”和“字”又怎麼區別呢？

因此，我認為：與其把“打架”、“打仗”等列入“語”，只要說明它們常常結合用在一起的這一特點便行了，不如把它們列入“詞”，只要說明這類詞有時可以拆開用這一特點就行了。

我的意見歸納起來有如下兩點：

一、在區別動詞和詞組的時候，應該承認“在一般的情況下，如果動詞後面有賓語，句子中又加個動詞詞尾‘了’（或

者“着”“过”等等)，我們總是把這些詞尾直接加在這個動詞的後面”(引自原文)這一語法規律，但是也應該同時承認有個別的詞例外，即一般的規律不要否認特殊的情況：

二、在區別詞和詞組的時候，不應偏於“詞”一方面的語法特點，而同時要注意到“詞組”甚至“字”的語法特點。

(鍾本康)

鍾本康先生提出的問題是一個很久以來懸而未決的問題。現在把我的意見再說明一下。

動詞加上賓詞所構成的詞組問題，林漢達先生在《動詞的連寫問題(下)》(《中國語文》1953年10月號)中曾經作過詳盡的分析。他提出：“及物動詞跟直接受詞分為兩個詞兒”一點，我完全同意，鍾本康先生對這點似乎也沒有異議。林漢達先生提出的“動詞跟自身受詞連寫為結合動詞”一點，是我在前一文中所反對了的，鍾本康先生提出的問題也就在這兒。因此，應該較全面地談一談林漢達先生的意見。

區別“自身受詞”跟“直接受詞”，按照林漢達先生的意見，是“不能從形式上來看”的，而“可以從意義上看得出來”(《中國語文》1953年10月號6頁)。先不去管為什麼在區別別的詞與詞組時，他不太“從意義上看”，而在這個問題上却要看看意義。我們先來看，自身受詞真的是像林漢達先生所說的那樣：是“補足動詞所表示的動作，共同說明主詞所做的一個行動”嗎？(同上，重點是我加的)。就拿他所舉的例子來看，“做夢”的“做”何嘗有自己平常所用的意思，“夢”哪裏是“補足”這個動作的？我認為，這些詞組常用在一起，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常用在一起的東西多了，難道一定是“詞”嗎？“發燒”，“推磨”，“生病”都常用在一起，但是當我們用它們來造句的時候，它們的語法的特點是什麼呢？再看用“打”(打)這個詞的情況，當我們在後面加上一些常用賓詞的時候，難道也都合成了詞了？舉些例子：“打場”，“打擺子”，“打針”……一直到“打仗”，“打架”。這兒若說“打”還有“打”的意思，而祇是“場”，“擺子”，“針”，“架”，“仗”丟了原來的意義，豈非有些偏愛了？

鍾本康先生提出了：“‘架’，‘仗’都不是獨立詞(不能充當一定的句法成分)”，並舉了些例子來說明：“架已打過了”，“仗打了三年”，“架放在樓上”等等。是的，像這兒他所舉的例子是不行的，但是略有缺陷：“這一仗打得真漂亮”是常說的。“架放在樓上”的所以不通，就像“牛”跟“雷”硬要合在一起成“牛雷”而變得可笑一樣。

所以，說它們不是“獨立詞”是不恰當的，至於它們獨立了就不表示原來的意思，甚或完全失去了意義(如“打擺子”中的“擺子”)，那就是這類詞組的特點。所以在上文中我曾經特地指出這一點。

“意義你到底管不管了？”要管的，但是在研究語法時，首要的問題是要研究語法上的特點，也就是詞法和造句的規則。要知道，在我們的詞典還沒能把所有的詞思都給記下來之前(這是非常困難的)，要想給方塊字的找出“由意義出發”的語法規則，恐怕會爭論不完的。

應該指出，漢語中詞的構成的一個來源，就是動詞它的常用賓詞(或稱“自身受詞”及“假受詞”)結合成新詞。且這些新詞逐漸多起來了。林漢達先生所舉的：“出席”“席”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注意到，按這詞法所產生的詞是會有不同的語法特徵的，諸如有的成物動詞，有的成了不及物動詞之類。“起草”按林漢達同志說法，是一個結合詞。因為我們常說：“起草了一個宣言”“起草了一個決議案”等等，所以我認為在這裏它是一個(不管是結合詞——複合詞，是複音詞，但是是一個詞，是肯定的。因為結合詞複音詞和詞組不是鼎足而三的東而且是一個及物動詞(不是像林漢達同志所說的，“是一及物動詞”)。

“革命”，“鞠躬”是什麼？坦白地說，我不知道“革命”在“革了他的命”中的用法是應該怎麼解釋的。魯迅先生《阿Q正傳》裏也的確借阿Q之口說過“革這夥媽媽的命”是我想這個用法倒是應該列入“例外”一項中去的。不是人說：“滑天下之大稽”，“努一把力”，“服個大務”嗎？像林漢達先生所說的，把它們歸入“俏皮話”裏去也未嘗不可。“革命”的一般的常用現象告訴我們，它是一個詞，是兩過獨立意義(當然不一定是“革他的命”中的那個意義)組成的。至於“鞠躬”，照前面所提出的論點，是詞組，詞。鍾本康先生的例子就說明了這一點。

最後，鍾本康先生提出了：把“打仗”“打架”等列入“而說明這類詞有時可以拆開用。這一點和林漢達先生提不全相同，因為這兒鍾本康先生把“打了三年仗”之類詞拆開用，而林漢達先生則把這種結構叫作：“拆開來短語”(不知是否了解對了？見《中國語文》1953年10月頁)。“改成短語”的說法，如果去掉“改成”兩字，就完全注意了，因為事實上這兒無所謂“拆”和“改”，而是兩個或詞的組合(如“唱了一首歌”等)。如果說是“詞可以拆開”，我認為不能這樣說。這個“拆開來”是牽動很大的。怎麼詞之中可以加上詞尾、用數詞和量詞(或名詞)構成的修等等一大串句法上的成分呢？這不能和“行得通”、“行不(“說得上”、“說不上”；“犯得着”、“犯不着”等)和“吃得(“吃不完”(“住得下”、“住不下”等等)相比較，因為這兒有什麼句法上的東西的，它祇是詞的本身加上一個音節(或“得”)表示某種固定的意思的詞法上的特徵。(鍾



# 略語是不是詞兒？

在《中國語文》35期發表的《“停”是詞嗎？“止”不是詞》一文中，呂叔湘先生回答潘山先生的問題說，“工農聯”“工農幹部”“工農速成中學”中的“工農”應該算是一個詞。

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認為這裏的“工農”是一個略語。一個例子的“工農”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略語，後一個例子的“工農”是“工人”和“農民”的略語。如果一定要把“工農”看作是一個詞的話，那末，我們經常說的“工農兵”也是一個詞了。我想，呂先生大概不會認為“工農兵”是一個詞吧。

很明顯，“工農兵”也是略語。這我們可以从毛主席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文中找到根據。毛主席在該文說：“既然文藝工作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了一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他在該文的另一處又說：“我文藝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農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們的幹部”（見《毛澤東選集》872頁）。由此可見，“工農兵”是“工人”“農民”“士兵”的略語。

“工農兵”既然是略語，那末，“工農”也應該是略語。同樣，呂先生在同一文中舉的“津浦鐵路”，“數理課程”中的“津浦”和“數理”也不是詞，而是略語。前者是“天津浦口”的略語，後者是“數學”“物理化學”等的略語。

正如在同期《中國語文》上林漢達先生的《什麼不是詞——大於詞兒的不是詞兒》一文說的：“略語不是詞兒”。這林先生說得很清楚，我就不重複了。（鄒國統）

\* \* \*

略語是不是詞兒？這是值得討論的問題。鄒國統先生引述林先生的論文，認為略語不是詞兒。林先生在那篇文章說，略語和詞有分別，“因為詞兒是可以普遍運用的，而略語只能在一定的環境裏有限度地使用。如果把略語都當做詞，那一定會增加聽話人的負擔，而且不一定全聽得懂，寫字寫下來，有時候也會發生誤會。新華社幾次三番通地寫通訊要用全稱就是這個道理”。這一段話主要是反對濫用略語，這是大家都同意的。但是已經通行的略語，現在使用的普遍性上跟詞兒還有差別，那就恐怕不符合林先生也說，“最常用的略語可以發展成為詞兒，例如‘工農’”。

一般人不同意承認略語的詞的資格，無非意識到它在語法上是一個詞組。但是从語源的角度看，好些詞原來都是詞組，都可以說是一種“略語”。“語言”和“文字”可以概括成“文”，“文學”和“藝術”可以概括成“文藝”，如果承認“語言”“文藝”是詞，為什麼不能承認“理化”和“工農”是詞呢？由“江寧”和“蘇州”的第一字構成的“江蘇”，由“安慶”和“九江”的第一字構成的“安徽”都取得了詞的資格，為什麼“工農”不能取得詞的資格呢？

有人會說：“一個詞代表一個概念。‘語文’，‘文藝’，‘江蘇’，‘安徽’，都代表單一的概念，自然是詞。‘工農’，‘理化’，‘津浦’並不代表單一的概念，怎麼能算是詞呢？”要知道用單一的概念和非單一的概念來判別詞和非詞是很困難的。不是有些人說“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三個詞而是一個詞嗎？分析語言的結構是不能從概念出發的。這當然不是說單一概念和非單一概念的分別沒有參考價值。我們說“工農”，“理化”，“津浦”等等是詞，同時承認它們是特殊類型的複合詞。

在分析漢語的結構的時候，把這一類“略語”當作詞的一個特殊類型，比把它當作短語的一個特殊類型，在理論上更說得過去。短語的特徵是它的成分是兩個（或更多）獨立的詞，而“略語”，正是由於它經過了一番簡略，它的成分不能獨立了，這就更符合於詞的特徵了。如果把“略語”當作短語的一個特殊類型，勢必要承認那裏面的成分是詞。我們能不能承認“工”，“農”，“理”，“化”，“津”，“浦”等等在現代漢語裏還都保有詞的資格呢？恐怕不能吧。（“略語”的情形跟“成語”還不一樣。“成語”裏常常包含一些一般不能單用的字，然而在那裏還不能不承認它是詞，例如“三心二意”的“意”。但這是古代語法的遺留，是不能生產的，而“略語”則天天在那兒產生，是現代漢語構詞規律之一。）

林先生的論文裏還用拼音文字的情況來說明。“例如 C. C. P. 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略語。中國因為一向使用的是漢字，又因為漢字只有簡寫而不能有略寫，因此我們只有略語而沒有略字”。這就是說，我們只能有“蘇聯”，不能有“C. C. C. P.”。實際情況是如此。可是按林先生的意思，儘管形式上有這樣的區別，但是性質相同，都是略語，應該同樣處理，這就大可商榷了。形式的差別是要影響到性質的，不應該拿“蘇聯”跟“C. C. C. P.”相比，應該拿它跟 КОЛХОЗ（集體農莊），СОВХОЗ（國營農莊），ЗАВКОМ（工廠委員會），ПРОФБИЛЕТ（工會會員證）等等相比。从 КОЛЛЕКТИВ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兩個字各取第一音節，造成 КОЛХОЗ，這個情形正和我們从“蘇維埃聯盟”摘取“蘇”和“聯”造成“蘇聯”相似。俄語裏有理由把 КОЛХОЗ 等等當作詞，我們漢語裏也有理由把“蘇聯”，“理化”，“工農”，“津浦”等等當作詞。

在實用上，也是當作一個詞便利。林先生主張不把這類“略語”放在詞彙中間而放在後面做附錄，這是很不方便的，因為如果讀者不知道這是“略語”，他是要到詞彙中間去查的（要是已經知道是略語，就用不着查了）。尤其在改用拼音文字之後，更加無從預先辨別它是否“略語”；即使加了短橫也沒有幫助，因為有些複合詞大概也是要加短橫的。如果把它當作一個詞，放在詞彙中間，那就沒有這些問題了。

“略語”的情況很複雜，上面所說只是比較簡單的一類。在拼音文字裏怎樣處理各種各樣的略語，這是很值得研究的。

（呂叔湘）

# 新書介紹

## 語音常識

董少文著 (九月份出版)

全書內容分三部分：(1)介紹語音學的基本概念，用許多插圖表示發音的部位和方法。(2)是全書的中心，用音標和注音字母對照，說明北京話的聲母、韻母和聲調。(3)大略說說北京音和其他方言的異同。本書的特點是從頭說起，可供初學語音學的讀者和中學語文教師參考。

## 漢語講話

王力著 (在排印中)

這本書原名“中國語文”講話，曾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現在由作者作了較大的修訂和改寫，改用今名。第一章先講漢語的特性，漢語的親屬及其方言分類；第二、三、四、五章分別討論漢語語音、語法、詞彙和文字四方面的問題，着重在漢語的特點、方言的異同及其歷史發展。目的在用深入淺出的語言，全面而扼要地講述關於漢語基本的知識。適宜於作為中學語文教師和一般語文學者的參考用書。

## 廣東人怎樣學習標準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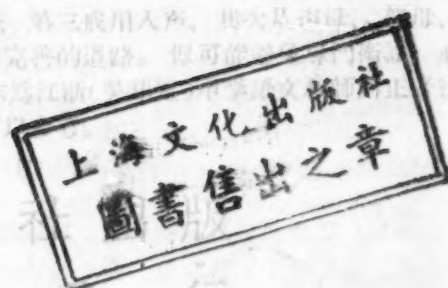
王力著 (在排印中)

這本書原名“廣東人學習國語法”，曾在華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現在由作者略加修訂，改為今名。所謂廣東人是包括廣州、客家、潮州、海南四個方言區域的人。書中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總論，把上述四個方言區域的人所應該共同注意的地方概括地敘述一番；第二部分是分論，分別敘述廣州人(包括“粵語”區的人)、客家人、潮州人和海南人學習標準語應該特別注意之點。在敘述中儘可能避免專門術語，並且多舉具體事例，多談音理，使它成為通雅易懂的一本書。適宜於作為廣東的中學語文教師講正音法時參考之用；一般語文學者想要了解廣東方言情況時，也可以參考。

## 江浙人怎樣學習標準語

王力著 (在排印中)

作者用由淺入深、由主要到次要的方法，敘述了江浙人(即吳語區域的人)學習標準語時應該注意的各點。首先敘述三大戒：第一戒用濁音，第二戒用低調，第三戒用入聲，再次是語法、音調各方面說明江浙話和標準語的異同。最後談到怎樣達到完善的道路。但可能必須用到專門術語的時候，也必先加以淺顯的說明。適宜於作為江浙中學語文教師講正音法時參考之用；一般語文學者想要了解江浙方言情況時，也可以參考。



文化教育出版社  
新華書店發行

北京市期刊登記證出期字第022號  
中國人民郵政登記為定期出版物

每冊定價人民幣0.20元  
(訂閱刊費預付，按季匯訂)

中國語文

月刊  
1955年8月号

第38期

1955年8月22日出版

社長 章詒

編輯委員 丁西林

杜松芳

高名凱

倪海曙

莊一棟

袁牧之

黎錦熙

總編輯 林漢達

王力

吳曉鈴

陸志韋

章詒

傅學勛

葉羅士

魏建功

呂叔湘

林英達

陳 蘭

曹伯純

葉聖陶

鄭之珉

羅常培

編輯者 中國語文編輯部

北京前門外大街

出版者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前門外大街

印刷者 北京印刷廠

北京前門外大街

總發行所 郵電部北京

計開處 全國各書局

代售處 全國各地新華書店

預定：三個月0.60元，半年1.20元，全年2.40元。寄費：1.平郵寄費不計，2.掛號郵費由訂戶負擔。